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徐闻古港

——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

刘正刚 乔素玲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 [星座篇]

黄伟宗 / 总主编

1. 《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刘正刚 乔素玲 著)
2. 《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
(王元林 著)
3. 《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
(谭元亨 著)
4. 《侨乡三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
(司徒尚纪 著)
5. 《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
(刘永连 谢汝校 著)
6. 《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王潞 周鑫 著)
7. 《海上敦煌——南海I号及其他海上文物》
(崔勇 张永强 肖达顺 著)
8. 《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
(郑佩瑗 著)
9. 《香茶陶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
(冯海波 著)
10. 《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与发展》
(陈韩晖 吴哲 黄颖川 著)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X u w e n 洲 G u g a n g

徐闻古港

——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

刘正刚 乔素玲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馆) 编, 刘正刚, 乔素玲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5. 3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星座篇)

ISBN 978-7-5454-3701-0

I. ①徐… II. ①广… ②刘…③乔…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②文化史—徐闻县 IV. ①K203②K29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71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本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2.75 2 插页
字数	200 000 字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454-3701-0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编撰组织成员名单

总组委会

主任：徐少华

副主任：李贻伟 张小兰 周 羲

总编委会

主任：张小兰 周 羲

副主任：黄 尤 麦淑萍 彭 赞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培楠 王肇文 卢锡铭 乔建葆 周克元 洪三泰
索建元 黄淼章 梁桂全 甄伟钢 蔡高声

学术委员会

主任：黄伟宗

副主任：司徒尚纪 谭元亨

委员：张 磊 陈永正 田 丰 徐远通 侯月祥 顾润清
叶春生 黄启臣 曾 骐 韩 强 章文钦 张其凡
杨兴锋 郑楚宣 吴松营 陈海烈 李庆新 王元林
刘正刚

编辑部

总主编：黄伟宗

副总主编：王培楠 司徒尚纪 谭元亨

总主编助理：郑佩瑗

编辑部成员：张 涛 曾 韬 王鹏程 谭 劲 莫羨春
钟振宇 庄福伍

执行编辑：赵韶沁 李海春 张琰琰 符文申 黄莹莹 郑旭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 编

总 序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周 義

为响应中央关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号召，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及其所属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作出了《广东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研究系列项目》的策划，以陆续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带动这项系列项目工程的进行，是很好的，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央要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项工程，就应当是全方位开放并多层面共举的建设工程。

从研究开发对象的性质上看。海上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交往的交通线路，它以商贸往来为主，但又具有外交、军事、文化等性质；它主要是我国与海外诸国相互经济来往性质，但又有和平亲善的民间友好往来意义；这就是其全方位、多层面之所在，从而对其研究开发，就应当从这些诸多方位或层面去进行，才是全方位、多层面开放共举的研究开发。

从研究开发的内涵与空间上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顾名思义，自然应以研究开发当今现状和今后发展为重、为主，但也不能离开古代文化遗存及其发展源流的研究开发；丝绸之路有海上与陆上(含边境、草原)丝路之分，以及海陆丝路之间的对接通道的研究开发；在丝绸之路中又有多种类别之路，诸如宗教、华侨华人、学术、科技、教育、文化、海洋、渔业、农业、特产、工艺等行业领域的海外交流之路，以及海上丝路的港口、线路、地

域(省内外、海内外)的古今研究开发,都是具有全方位和多层面研究开发的内涵与空间,并且都是可将这些方位或层面以开放并举的举措去进行的。

从研究开发的途径和方式上看。对这项工程(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的进行,也应当采取全面开放并多层面并举的方针,即软件开发与硬件开发、方案策划与方案实施、理论与实践总结、文案研究与实地考察、考察发现与媒体宣传,以及研究中多学科的立体交叉、宣传中的多方式多渠道、开发中的实体工程与形象工程等,都是应当相互交叉同步进行,同时又是以全方位开放并多层共举的途径和方式进行的。

从研究开发的结果上看。这项工程应当既有逐步成果,又有总体成果,即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的途径和方式,是全方位并多层面共举,同时又相互交叉同步进行,从而势必在进程中产生每步的成果,同时又会在每步成果中出现全方位、多层面的诸多成果,最后在总体上产生出包含各步诸多成果在内,而又是“更上一层楼”的全方位开放并多层面共举的总成果。

以这样的理念指导、进行和完成的项目工程,必将不仅是取得项目成果的工程,而且是在进行的理念、途径和方式及其取得成果的模式上,都是比一般单项工程更丰富多彩而综合使用价值更高更大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及其成果,才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中,持续发挥出增强广东省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主任(馆长)]

前 言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的 发现和实证过程

黄伟宗

现在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第二辑[星座篇]，是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系列项目的组成部分，包括10部分册，即《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海上敦煌——南海Ⅰ号及其他海上文物》《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的曲折外贸之路》《侨乡三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香茶陶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和发展》。每部分册都是某个时期或某个种类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主要标志或群体研究的介绍著作，因这些主要标志或某类群体，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某个时期或某门类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光辉，故称之为“星座”（或称“星群”，下同。因为一个“星座”中有其包含的“星群”，而同类的“星群”亦可共称为一个“星座”）。所以，“星座篇”所含的10部分册，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的研究和介绍专著。

这十大文化“星座”，是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和珠江文化研究会（下称“我组我会”）的多学科专家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党组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进行珠江文化研究的同时，研

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迄今达20余年的进程中，逐步发现和实证出来的。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些“星座”的发现和实证过程，增进其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是有所裨益的事。

（一）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早在1993年夏天，我偕同省参事室文化组参事，到封开和梧州考察，发现这个地方原是西汉时的“广信”县，是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以汉武帝平定南越的圣谕“初开粤地，广布恩信”而取名，并在此设置统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后人简称“广信首府”，并由此界分广东、广西），且由此发祥广府文化、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同时，又从《汉书·地理志》中的一段记载得知：汉武帝也在这个时候，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国。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字记载。但是从未有学者到徐闻实证这个记载。

2000年6月上旬，正当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我等一行冒着酷暑，到达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在二桥、仕尾一带，发现汉代板瓦、筒瓦、戳印纹陶片，以及汉墓、枯井口、烽火台等遗存，综合之前考古学者在此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水晶珠、银饰、陶罐等文物，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等记载，与田野考察实证与史料记载结合判断，这即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旧址。我随即写出省政府参事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该建议受到省领导高度重视，即批准成立以黄伟宗参事为首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负责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这项发现和实证成果，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的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2001年11月下旬，项目组在湛江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

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百余名专家们，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的发现和实证，从而确认西汉徐闻古港是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星座”，同时发现和实证的合浦、雷州、遂溪等古港同是这“星座”的星群。

（二）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从2001年至2003年，项目组同仁先后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拓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南澳、广州、香港、澳门、台山、阳江、电白、遂溪、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古港，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漠阳江、鉴江、南流江、北流江等出海港口，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每个古港都有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而且在历史上呈现此盛彼衰的现象，但在总体上形成了从汉代至清代都不间断地有繁荣古港的形势和格局。由此说明，广东自古以来都有不间断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每个历史年代都有兴旺的古港和历史，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最完整的实地见证和体现，从而可见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而完整、港口最多而辉煌的海洋大省。所以，这一系列南海港群，是广东海上丝路由一批星群共现的文化“星座”。

（三）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在先后考察贯通湘桂至古广信（封开）的潇贺古道，以及南雄梅关珠玑巷时，已对海上与陆上丝路之间对接现象有所觉察，但真正意识到其重大意义则是本世纪初对这两条古道的再次考察。这两条古道的遗址和史料，都证实其本身从来就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功能和意义。前者在《汉书·地理志》中已写明，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而出海的。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么？南雄梅

关古道是唐代贤相张九龄主持开通的。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明了其目的，是为沟通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和往来。与梅关相连的珠玑古巷，是唐宋以来中原南下移民岭南以至海外的中转站，致世界广府人皆认其为“吾家故乡”，可见梅关珠玑巷在历史上起到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南雄乌迳古道、乳源西京古道、连州南天门古道，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等水道及其相应的水陆通道，遍布全省，可见水陆古道是广东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所以也是由诸多海陆丝路古道星群共现的一大文化“星座”。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最近我们到梅州市考察，在大埔发现晋代开拓连接闽粤的梅磜古道的同时，在梅县松口发现了“南洋古道”。因为这里建有中国内地唯一的“世界移民广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发起的旨在纪念海外华人的“印度洋之路”项目，并先后在马达加斯加的多菲内、留尼旺的圣保罗、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岛、科摩罗的马约特、印度的本地治里等地建设了同样的移民广场，在梅县松口建“广场”，是为了纪念19—20世纪离开中国前往印度洋群岛的中国人，同时，松口也是客家人“扬帆出海，开拓进取”的始发地，客家华侨的回归地，又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和印度洋国家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中枢地，所以，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印度洋之路第一港”，既是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又是江海对接的通道。

（四）“海上敦煌”——南海Ⅰ号及其他海上文物

阳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从发现、出水到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安放，历时十年有余，自始至终都是世界性的新闻大事，因为这条沉船，是迄今世界上出水历史文物中，历史最早、体积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价值最高的文化遗存。由于其是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运货船，因此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性质；而且其文物以瓷器为主，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点；尤其是以往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多是海岸文物，海中实物甚少。所以，2003年9月项目组对其考察时，我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词。

从此，南海Ⅰ号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号。我作此定位的依据是：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最多的是甘肃敦煌，约有6万件，故甘肃敦煌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而阳江南海Ⅰ号沉船中的文物，估计有6万~8万件之多，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优势，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故称“海上敦煌”。由于当时《阳江日报》报道南海Ⅰ号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并在网上传播，被正在中山大学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培训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知道了，便托人找我引领，于2004年元旦前往阳江考察。当他们认真观看了南海Ⅰ号少量出水文物和听取介绍之后，当即表示“世界少有”，并认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著名的海洋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台湾“教育部长”兼成功大学校长吴京教授知悉并打电话到中大，请我邀请他来考察南海Ⅰ号，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我陪他到阳江考察。结果他对南海Ⅰ号的评价更高，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接着他在中山大学对研究生作报告时又讲到，南海Ⅰ号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高峰。所以这无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大“星座”。稍后发现和出水的南澳县“南澳Ⅰ号”明代沉船，也有相近的文化遗存和影响，应当属这一同类“星座”。

（五）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

2000年6月，项目组到韶关曲江南华禅寺考察。南华禅寺是东晋时期印度和尚智药三藏兴建的，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认南华禅寺为“祖庭”，并自建“分庭”，尤其是禅宗六祖惠能在南华禅寺弘扬禅宗文化，将外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其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禅宗佛教“真正的创始人”，被世界媒体称为“东方三圣人”“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之一。南华禅寺的创建及其世界各地的“分庭”，以及六祖惠能的世界影响，都经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的“西来初地”，是东晋时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登岸地。达摩是中国禅宗教派始祖，由此其登岸地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

是“佛教传播之路”。稍后在肇庆考察时，发现明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传入天主教的同时也传入西方现代文明，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传进西方，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接着又在广州的石室教堂见到基督教从西方传入的史迹，从而感悟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在广州的怀圣寺见到伊斯兰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史迹，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传播之路。在广州的光孝寺、六榕寺和新兴的国恩寺，还看到佛教传入传出的国外的记载，以及在广州参加过出海祭神的南海神庙庙会，在各地见到拜祭“海神”的妈祖庙、天后庙和“江神”龙母庙等，使我更深更广地感悟到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之路，进而感到这些从海上传遍岭南各地的宗教信仰文化有似“沧海航灯”般的文化星群，自然也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文化“星座”。

（六）广州十三行——明清300年的曲折外贸之路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最大的商帮——粤帮的统称，又近似明清时代“海关”，是清乾隆至同治年间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并具海关职能的口岸，历时300余年，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结束。在其兴旺时期，全世界5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分号或代办机构，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则更多。所以，十三行实则是清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标志，是海上丝路即外贸之路的典型，很有历史文化意义。近十年来我和项目组的多位同仁，为发掘其文化遗产都多次撰写过调研报告和参事建议，以及历史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作品。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路文化一大“星座”，其星群遍布世界五大洲。

（七）开平碉楼、侨墟楼、排屋楼——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

海外华侨华人和侨乡文化，实质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产物和体现，因为出海回归、联络交流，都必经海上丝路，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是

华侨华人之路。自2006年以来，项目组一直关注华侨和侨乡文化现象，多次到江门、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蓬江、东莞，以及潮州、汕头、汕尾等地考察，先后发现并提出“广侨文化”“客侨文化”“潮侨文化”等文化现象和文化定位，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是2006—2011年，项目组先后到开平考察，发现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和台山的“侨墟楼”，以及东莞凤岗的“排屋楼”，都具有见证海上丝路文化即华侨华人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因为这三种文化，都是华侨华人文化与广东三大民系（广府、客家、潮汕）文化交叉融合的文化形态；而这三种“楼”，则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实体体现，并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和载体。特别是“侨墟楼”，它是侨乡中墟集商市的总称，因其既是传统农村墟集，又是华侨投资所建的“楼”，并有与海外通商的码头和商行，具有自十三行统管海外通商结束后，所出现的中国海外通商在侨乡遍地开花的转型意义，所以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侨乡泛化的体现。此外，潮汕地区的“红头船”和“侨批”等现象，以及珠海在近代出现的容闳所开拓的“西学东渐”和中国留学生之路，也都是华侨华人文化即海上丝路文化的实证，是华侨华人之路的丰碑和星群。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文化“星座”。

（八）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

位于广州西关的锦纶会馆旧址是清代建筑，它是广东最早的丝绸行会成立地，也是广东丝绸行业历史变迁和海外丝绸贸易兴衰发展状况的见证。如果说这座历史文物是广东丝绸业“前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广东丝绸业“今生”的文化载体则非广东丝绸集团莫属。所以，可以“古锦”和“今丝”四字而喻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广东丝绸集团总公司及其所代表的南方丝绸行业，是项目组自成立以来一直合作的伙伴，既共同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又考究南方古今丝绸生产和贸易发展之路，从中发现广东的丝绸生产与贸易早在清代已位于全国前列，珠三角以桑基鱼塘围海造田繁殖丝绸生产，陈启

源最早创办现代机械缫丝厂，“广丝”（尤其是香云纱）“广绣”风靡海内外，可谓“今丝”品牌，一直古今不衰，改革开放后更是蓬勃发展。据该公司统计，迄今已行销海外181个国家和地区，可见丝绸贸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干之一。所以，这也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又一大文化“星座”，其星群遍布海内外。

（九）莞香、茶叶、陶瓷、南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

东莞自古是著名的香料生产贸易之乡，所产香料多为沉香，因其质特优，被誉名“莞香”，“女儿香”是其最名贵的品种和代表。据刘丹《女儿香》描写：“女儿香”乃东莞地道著名土特产，亦为东莞最负盛名之皇家贡品，又是畅销海内外的特产商品。史载：明末清初盛景年间，“岁售逾数万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常常一艘艘载满莞香的货船从东莞运至香港，使莞香成为和茶叶、陶瓷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也使得转销莞香至海外的港口冠名“香港”；近年我们先后到东莞寮步、大岭山考察，仍可见到售香赏香如潮的“香市”景象，此可谓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香料之路的根由。

其实，海上丝路主要是运销土特产至海外，同时又运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到中国，互通有无，古今如此。广东的出口特产或高新尖产品很多，如佛山陶瓷、潮汕茶叶、英德红茶、肇庆端砚、湛江南珠、怀集金燕，以及当今东莞制造业产品、云浮石材产品等，都是行销世界的商品。所以，海上丝路即是茶叶、陶瓷、珍珠、燕窝等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尤其是最新的制造业、物流业、运输业、科技业等进出口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对广东来说这些都是特别兴旺发达的，也是星群特多特大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星座”。

（十）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广州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

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可谓海上丝绸之路之新生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渠道，有“中国第一展”之称，20世纪80年代后“广交会”取得巨大发展。迄今“广交会”已成功举办116届，而且从开始的“出口商品交易”，发展为现在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交易面和交易额均与时俱增、俱进，带动了会展业在广东的飞速发展，如影响世界的深圳“高交会”“文博会”等，都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一大文化“星座”和不断持续发展的星群。

以上是迄今我组我会发现和实证出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星座”。正如宇宙太空的星座星群尚需不断发现那样，我们将再接再厉，持续努力发现和实证出更多更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文化“星座”星群。

应当特别郑重地指出的是：我们所称之“发现”，是因为这些“星座”的文化景点或旧址虽然早已存在，人们也很熟悉它，但尚未有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上，去认识和发掘它的文化内涵和作出文化定位，而我们则是首先这样做，故以“发现”谓之。所谓“实证”，是实地考察证实之意。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与文案研究相辅相成的。这十大“星座”都是我组我会多学科专家教授20余年来，结合文案研究进行实地考察而逐步发现和实证出来的。显然，这样做虽然实实在在，并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毕竟学术提炼的火候不足，匆促、感性、粗糙的缺陷难免。正因为如此，在制定《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工程项目规划》中，我们特地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项目，弥补以往的不足，尤其是特地组织[星座篇]的写作，将以往发现、实证的成果进行学术深化。

[星座篇]10部分册的作者，多数是从当年起步时即参加考察过程的专家教授，部分后起之秀，也是对其所写专题比较熟悉的学者或记者。从总体上说，他们都是对我组我会学术团队20余年考察发现实证成果的深化，是体现当今各个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是海上丝绸之路理论建设的学术系列专

著。另外，我们考虑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当向广大群众和外国朋友做宣传普及工作，使他们对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也力求每部书都图文并茂，尽量选用原始照片和引用原始资料，力求通俗易懂，并兼备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最后，我想借[星座篇]出版的机会向相关部门提些建议，仅供参考：

1. 建议省有关部门和上述“星座”所在地区或单位，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和需要出发，以古为今用、中洋并用的方针，继续深入研究、深入开发、深入宣传，尽力争取将其列入世界物质或非物质、生态或记忆的文化遗存或遗产，千方百计地使这些“星座”永远持续地迸发出更大的光芒。

2. 继续扩大发掘更新更大的“星座”及星群，如科技、海洋、渔业、水利、水运、农业、林业、工业、文化、文艺、教育等领域，从古至今都有与海外诸国交往的历史和实绩，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遗存和实绩，这些都是海上丝路文化的“星座”或星群，应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发扬光大。

3. 加大力度全方位地研究宣传海上丝路“星座”及星群，可以将现已发现的十大“星座”，编列出版研究书系，制作电视系列片，创作美术、摄影、散文、诗歌、音乐等门类的系列作品，以及邮票、明信片等。各行业、各领域新发现的“星座”及星群也可以这样做。而且，都可以将这些系列著作或作品，制成外售商品或对外交往的信物或礼品，作为我省的“名片”“品牌”打造，既是文化创造，又是扩大宣传，也即是持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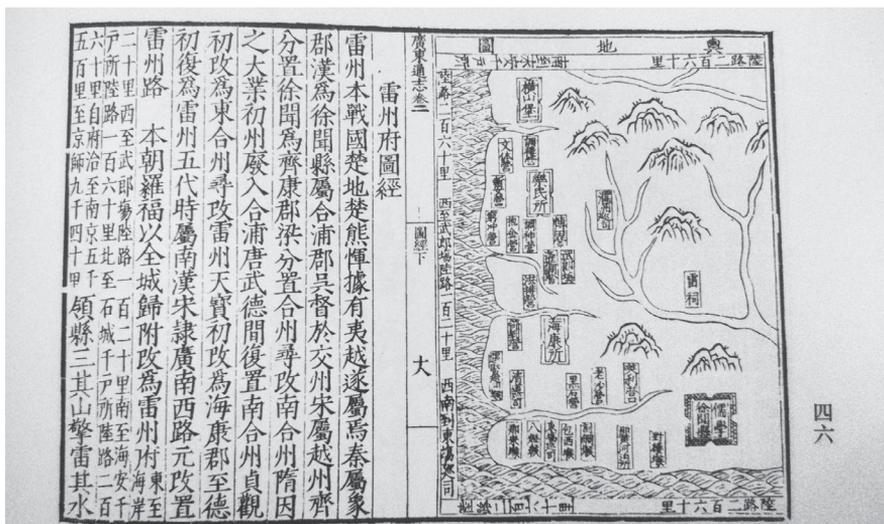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聘参事、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广东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专家智库成员、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学术委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化学者。）

徐闻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六、七千年前，徐闻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遣50万大军分五路征服岭南，又在今两广交界处的广西境内开凿了著名的灵渠，对中原和岭南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便利作用。最关键的是秦朝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三个行政区划，将岭南纳入了中原王朝统一的管理范围。自此以后，岭南地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及其文化影响之中，生活在岭南地区的百越族人与南下的中原人相互交流融合，加强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往来。

汉承秦制，对岭南统治的力度有增无减。秦末北方战乱之际，秦朝南海郡尉赵佗乘机自立为南越武王，占据了秦之南海、桂林、象三个郡。西汉建立后，仍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赵佗一度改南越王为南越武帝。西汉文帝时，迫于中原王朝的威力，赵佗不得不废帝号，仍称王。西汉武帝雄才大略，对边疆的经营十分重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了动荡中的南越国，并于次年将南越故地划分为九个郡，分别为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以及交趾、九真、日南。汉王朝将秦朝的三个郡扩大为九个郡，而行政区域的细化管理，恰恰显示了中央政权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尤其是中原汉族人民在汉代

帝国版图内的流动与迁居，也进一步密切了岭南边疆地带与中原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因此而促进了岭南海洋文明与中原内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徐闻设县即开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自此以后，徐闻作为一个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划，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据万历年间欧阳保编纂《雷州府志》卷一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冬十月，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置七郡，南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立徐闻县属合浦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交趾女子征侧、征二反，遣伏波将军马援平之，略地至雷……齐永明中，改徐闻县为齐康县，梁大通中分齐康县，置合州寻改南合州。”可见，西汉徐闻县属于合浦郡，后又改名齐康县、南合州等。



万历雷州府志·沿革

说起徐闻这一名称的来历，就是因为其地濒海，海涛之声不时传入耳内，故得名，此在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编纂的《雷州府志》就有如此说法，“徐闻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很显然，这一得名与徐闻独特的海洋地理位置有关。据后人考证，徐闻的县治自汉武帝设县开始，至南齐武帝永明年间约600年，一直设在其境内西南的讨网村。

徐闻设县的原因，当然与当地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有关，否则王朝国

家不会浪费行政资源，因为设县就要兴建一系列与行政建置有关的衙门，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国家公职人员。而徐闻的设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其具有独特的海洋贸易优势地理位置，因为随后在汉武帝时代就明确肯定徐闻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徐闻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也是雷州半岛唯一一个三面濒临大海的县，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之一，成为我国正史记载最早的官设海洋贸易口岸。

我国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编修正史的传统，正史在朝野士人的心目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正史，说白了就是由国家高层组织文化人所编写的前朝史书，并经过最高统治者的审阅而颁布刊刻发行的书籍，具有明显的官方行为。因此，正史所记载的内容，一般来说，也属于在前代王朝发展历程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大事件，也就是说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因此，能够在正史中留下一鳞半爪的文字，无论是对地方文化还是对家族文化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能被正史记录在案，要么是在当时王朝国家政治、文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么就是在王朝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地方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正史因为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而且在唐代以后又一直是士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目之一，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广东在宋代之前，一直被中原王朝和士人视为荒蛮烟瘴之地，也是王朝国家一直流放犯人的地方。按照一般的观念，广东被记录在正史中多以负面的形象居多，然而，广东濒临大海且气候兼具炎热与温暖的独特地理现象，又使得其境内的海洋珍宝闻名遐迩。徐闻就因为地处海洋贸易的交通要道，而被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撰的《汉书》卷28《地理志下》所记载，西汉时期海外贸易发达，位于南中国海南端的徐闻县，与合浦、日南等区域，成为当时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

秦汉时期是我国中原王朝开发航洋贸易——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时期，不仅在统一的王朝版图内通过海洋进行贸易，而且还不断将海上航线向更遥远的地域拓展。至少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已经表明，西汉时期，朝廷派出的官方贸易船队已经在之前民间海洋贸易的基础上，不断向西航行，抵达今天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此时在中国

海上船队向海外输入的商品中，丝绸亦是最大宗货物之一，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的则是海外各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等货物。

西汉初年已经可建造大型船只——楼船，船舱多至3~4层，船高10丈，可载1000人左右，外观似楼，故叫楼船。这种船载重量不大，停泊吨位也不大，当时的徐闻港适合这种航海设备与技术的要求。汉代的船尚不能抗拒大海浪涛，远海交通只可沿着海边行船，才较安全可靠。西汉时的楼船没有风帆，两边用橹桨划水前进，动力不足，在海上航行主要靠季风洋流推动。徐闻面临南海，南海季风与洋流为远航船只从徐闻港出海提供方便。每年10月至来年3月为东北季风，洋流呈西南方向漂流；5月至9月为西南季风，洋流向东北方向漂流。远航船只10月借东北季风从徐闻港出海向西南漂流，穿过马六甲海峡，经缅甸到达印度。以后又借西南季风返回徐闻。

汉代徐闻港遗址在今徐闻县南山镇二桥、南湾、仕尾村呈半岛形的岬角台地，西临华丰岭，北为那干溪，南临大海，东隔东岗洋与南山相望，1958年建成大坝阻断古港湾，而今化为农田。该遗址于1983年在徐闻县文物普查时被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建设日益成为国家和地方的头等大事，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徐闻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90年5月，广东省文物考古部门专家在此采获双山纹“万岁”瓦当。1993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市县考古部门联合在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型探方挖掘，其地层堆积的二、三、四层均为汉代文化层，从遗址中发现了墓葬、灰坑、宅基、水井、烧土面及柱洞等文化层。墓葬出土水波纹折腹盆一件，陶罐口沿和陶碗、陶网坠；灰坑出土大量绳纹瓦片、瓦当碎片、素面带釉陶片和小方格纹戳印陶片、水波纹陶片；宅基遗址4个，出土了大量瓦片和火烧土；水井1个，出土了瓦片、釜罐、杯、砖、钵碎片、铜箭镞。附近东岗岭发现大量汉代墓葬，出土“宜官”“帝君百石”“曲目”、布币纹及其他几何图纹印纹砖、陶屋、铁釜、铜鼎、陶罐等。

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在汉代徐闻旧城高台遗址的探沟里发现相对完整的卷云箭镞纹、绳纹瓦当，出现铁器、铜器、怪兽纹小铜铺首、陶罐等西汉早期文物，疑为汉代驻军兵房。至此，徐闻境内被发掘的汉墓达到200多座，出土了大批舶来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等物，在仕尾村保存有中国最早的航标灯座、航海八卦定位仪和侯官神座。汉代徐闻港遗址也逐渐清晰起来。徐闻县



徐闻出土的汉文物

汉代遗址是广东4个出土瓦当的汉代遗址之一，也是2个出土“万岁”瓦当遗址之一。证实汉代徐闻港——讨网港即今二桥、仕尾、南湾附近的港湾，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由此也印证了《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文史专家也积极开展对徐闻的学术研究，2000年6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考察团，亲临徐闻进行考察调研论证，确定徐闻县是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2001年3月7日，广东著名文史专家周义、黄伟宗等学者率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等专家学者再次赴徐闻考察调研，并召开了“徐闻：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专家论证会”，得出了如下结论：

(1)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朝廷派遣的使者从徐闻、合浦启航，这是史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据有关史料，徐闻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而后至齐永明中的六百余年均为郡县之治，治所在现徐闻县西南。

(2) 通过对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汉代生活遗址的考察，以及根据已有考古研究成果，可以认定，该遗址属汉代，年代跨度为西汉到东汉，出土遗物有较高规则的建筑材料，在当时来说，属官署性质。又据遗物出土地

点地理形势，符合城镇和港口遗址、布局条件。可见此地应为汉代徐闻县治和徐闻港所在地。

(3) 从遗址附近地区的华丰、海港、港头、那干、麻练村汉代墓群出土文物来分析，反映了汉代“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社会习俗，说明了当地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聚落达到一定规模，亦有一定等级的职官，这对确定徐闻治所、港口是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汉徐闻港在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遗址之一，而附近的二桥、南湾、仕尾也应是汉徐闻县治所在。

对徐闻汉代遗存的论证意见

今年三月六日，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省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到徐闻考察、调研。三月七日参加考察的专家、学者在徐闻召开了“徐闻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1、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从“徐闻合浦”启航。这是史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次记述。据有关史料徐闻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属合浦郡，而后至齐永明中的六百余年均为郡县之治，治所在现徐闻县西南。

2、通过对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汉代生活遗址的考察，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可以认定，该遗址属汉代，年代跨度为西汉到东汉，出土遗物有较高规格的建筑材料，在当时来说，属官署性质。可见此地是汉代徐闻县治和徐闻港所在地。

3、在遗址的附近地区，华丰、海港、港头、那干、麻练村有相当数量的汉代墓葬，形成群体分布，既有一般平民墓葬，也有职官的墓葬，出土文物有铜盆、铜三足鼎、铜尊（酒器）、铜镜、铁剑、铁环首刀、印章，吉祥语“宜官”、“帝君百石”、“曲日”、“凸”纹印纹砖，各种几何图形印纹砖，各种珠饰、银饰、陶器有网纹纹加方格、圆形、菱形戳印陶罐、弦纹、水波纹陶钵、陶罐、陶屋、陶井、陶壶、陶纺轮、网坠、陶牛、陶狗。反映了汉代“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社会习俗，说明了当地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亦有一定等级的职官，这对徐闻治所、港口是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在徐闻港即现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遗址之一。

二〇〇一年三月七日

论证专家签名：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顾问、兼职教授、经济学家：刘毅

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化学家：蔡仲光

广东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业务处长、副教授、语言学家：陈宗宇

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理学家：司徒尚尧

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海洋学家：甘子朝

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球地质学及规划学家：何志坚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黄若臣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秘书长、文史学家：刘永波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学家、副研究员：邱立诚

广东省丝棉志编委、广东省丝棉集团公司原总农艺师、广东省蚕业学会秘书长、高级农艺师：

专家签名

纪理记

应该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所发表的这一结论是谨慎而科学的，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而且有地下考古发掘的文物佐证，更有民间社会的习俗印记。为了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关注徐闻作为我国首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2001年11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和湛江市政府还联合在徐闻县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南方港”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工作，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徐闻县，成为2001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十大新闻之一。这不仅标志着古代徐闻港的重新被发现，而且也为广东西部的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参考价值。

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考古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再次对徐闻县的汉代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发现了西汉早期的文化地层。我们从徐闻多次考古发掘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在徐闻古港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与现存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十分吻合，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徐闻港因海洋贸易活跃，而吸引了各地人群聚集徐闻，进而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以来，文献记载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误断为今雷州南渡河南浦津即雷州港。其实，在汉代整个雷州半岛均属于徐闻县管辖，海康县也包括在内。但经广东省市考古工作者多次到雷州港考察，至今尚未发现汉代生活遗址遗物和汉墓群，缺乏确凿有力的佐证，因此称雷州港为汉代始发港，令人难以置信。后经考证，雷州港是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港。



目录

序言：徐闻古港的发现与实证

第一章 汉代徐闻港的海上贸易 /1

- 一、丝绸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2
- 二、徐闻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6
- 三、考古发掘印证徐闻、合浦为始发港 /15
- 四、徐闻港海洋贸易的货物 /21
- 五、汉末以后徐闻港逐渐让位于广州 /25

第二章 徐闻港贸易的社会影响 /29

- 一、雷州半岛的商业活动 /31
- 二、徐闻及雷州半岛的“中枢”联接 /36
- 三、港口与墟市的不断增多 /41
- 四、雷州半岛的商人会馆 /46

第三章 北部湾的珍珠采集与养殖 /57

- 一、秦汉北部湾的珍珠采集与管理 /59
- 二、唐以后官府组织采集珍珠 /70

三、北部湾疍民的采珠方法 /76

第四章 唐宋以来徐闻及雷州半岛的移民开发 /81

一、徐闻及雷州半岛的移民历程 /83

二、方言显示徐闻及雷州半岛移民来源地 /94

三、移民对徐闻及雷州半岛的开发 /101

第五章 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枢纽 /113

一、汉至南朝佛教传入必经之路 /115

二、雷州半岛的佛教寺庙 /122

三、中原文化在雷州半岛的传播 /129

第六章 徐闻及雷州半岛的海神信仰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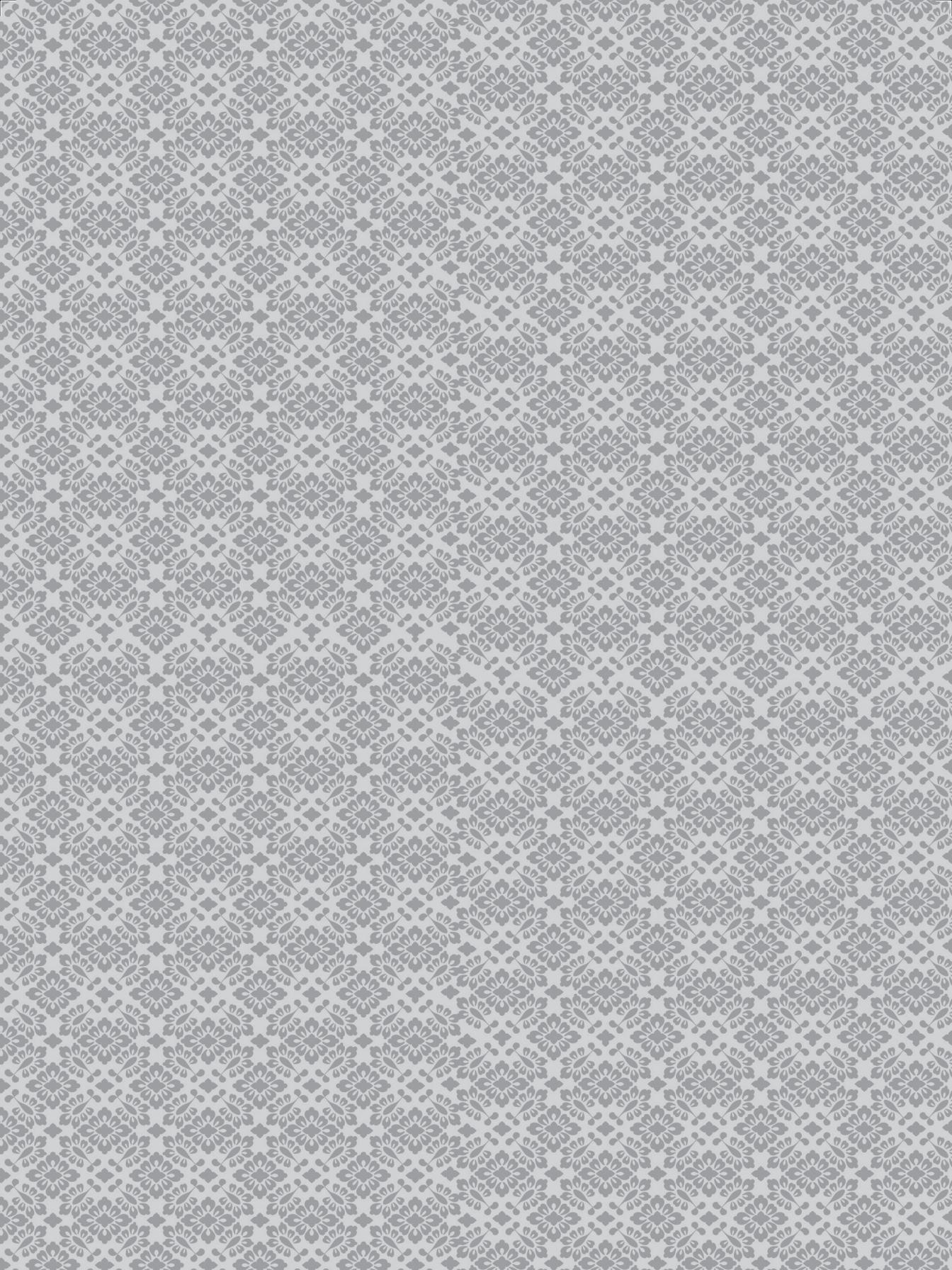
一、伏波将军与北部湾海域稳定 /143

二、天后信仰与雷州半岛的海洋经济 /153

三、雷州半岛的其他神灵信仰 /166

结语：以传统海洋经济文化为鉴 /173

后记 /176



第一章

汉代徐闻港的海上贸易

徐

闻

港

港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短暂大一统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大一统时间最长的王朝，在经历了文景之治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更是将中华文明推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自此以来的历代王朝统治者和士人均以汉朝作为中华文明的骄傲，一直以追赶汉朝作为王朝统治的目标。汉代的统治者不仅积极开拓疆土，而且十分注重与周边四夷以及海外各地的联系，开辟了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从徐闻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北方的陆路和南方的海路同时并举，密切了汉王朝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南方以徐闻为始发港的海路开辟，不仅通过海路向海外世界输送了中国的丝绸等物质文明，而且也向西方输送了中国的精神文明，于此同时，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也通过海路传入中国，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是中西方之间的商业贸易之路，而且也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之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还说明，中国自古以来不仅重视陆疆的开发，而且也十分重视海疆的开发，至少显示我国是陆海并重的国家，而非仅仅是某些人所误以为的单一黄土文明。

一、丝绸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国”这一概念随着华夏族意识的形成而不断发展变化，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人出于“天下”的概念，因而认为“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其四周则分布着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普天之下都要向中国进贡称臣。秦汉统一中国后，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央王朝并没有改变这一固有的观念。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得以延续不断的灿烂文化，也确实吸引着普天之下向中国朝廷称臣纳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主动走出去。中国与四夷及更遥远的地区进行交流与贸易，到底始于何时？已经很难确切给出年月日的答案。研究者认为，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换回国内没有或少见的四夷珍品。

绸种类之多。正是由于秦汉时期丝绸种类多，数量大，中国丝绸成为海外四夷最喜欢的商品之一。

秦汉时期，中国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周边尤其是西方各国进行沟通与交流，中国的丝织品已远销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亚欧各国纷纷以本国特产诸如象牙、玛瑙等交换中国的丝绸。中国在长期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交流与贸易中，逐渐形成了陆海两条较为固定的线路开展对外贸易，因当时中国输出的财货以丝绸为主，故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有陆路，也有海路。

学界一般以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开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得益于汉匈之间的战争，据《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记载：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骞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从上述《汉书》记载看，西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派遣张

骞出使西域，张骞经过匈奴时被捕，后逃至大宛，在大宛国的帮助下，历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可惜此时大月氏王已经被杀，其夫人臣属大夏国，因为安乐而不愿联合西汉攻打匈奴。张骞遂打算返回，在返回时又被匈奴所捕，后利用匈奴内乱时机逃出。《汉书》所记载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都在今中亚地区，《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里五十里，东至都护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抵康居。康居国，在京西一万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也。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媯水北为王庭，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陆上丝绸之路主要走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打通了从长安到达西域的通道，人们一般把张骞出使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张骞此次出使西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这条横贯欧亚的交通线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影响深远。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丝路》。从此，丝绸之路、丝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

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印刷术也随着丝绸之路逐渐西传。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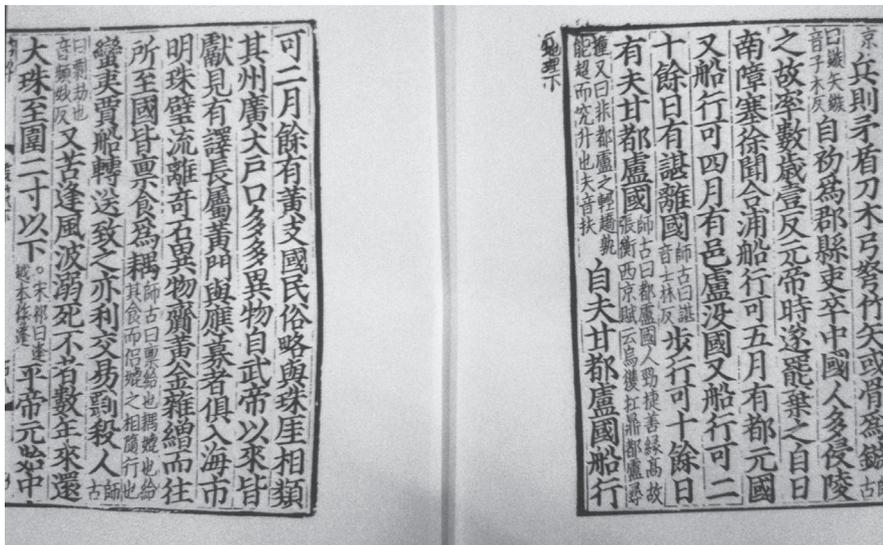
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利用印刷术印了一部《圣经》。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二、徐闻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具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因素的话，即西汉武帝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攻打匈奴，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通往西域的道路，那么西汉时期从岭南地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更多是出于商业贸易的考量。

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茶叶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于秦汉时期，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靠海吃海，积极向海上发展。这条航线由于运输货物的不同，又有许多别称，随着阿拉伯半岛及东南亚香料的输入，这条航线又被称为“香料之路”。现今最早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史记载，就是成书于东汉年间由著名史学家班固所撰的《汉书》卷28《地理志》，其内容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书·地理志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由官方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稀见史料。从中可以推断，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南方，而且是在今天广东省境内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西汉徐闻港的出现与繁荣已经得以证实，其在南海丝绸之路中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历史地位。然而《汉书·地理志》中对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只是模糊地称为徐闻、合浦、日南等地，那么徐闻作为始发港之一，其古港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

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多次举办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史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的徐闻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时徐闻属于合浦郡管辖。徐闻在雷州半岛，隔海与海南岛相望，又处在汉代南海、合浦两郡交界的最南端，通过海洋向南和向西航线即可抵达海南和南亚等地。最关键的是西汉时期，徐闻港属于官方开辟的航线，成为官府和商人共同经营的大海港，这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汉代在徐闻县南七里设置左右侯官可以得到印证。徐闻南七里，又意味着更接近海洋，或者说就在濒海之地，而左右侯官的职能应该是囤积中外贸易所需的货物，以供中外商人采办，“与交易者有

利。”可见，汉代在雷州半岛最南端设立徐闻县本身就意味着王朝有海洋贸易的伟大构想，设立左右侯官则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这说明徐闻港在汉代是由官商共同打造的海外贸易基地的成功范例。

徐闻港地处琼州海峡，为南海郡治所番禺出海船只向西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往来海南岛的必经之路。汉代设置少府管理皇帝私人财产，下设各种属官，如考工掌管制造弓、弩、刀、甲等兵器，制成后的刀甲等兵器藏在武库，又如尚方则掌管制造御用刀剑及上等器物。凡少府各官所用人工主要是徒和奴。少府所属各官的制成品，如果不是皇帝赏给臣下，臣下不得私自使用。汉代的海外贸易也由少府专营，其属官之一的黄门，主要是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皆由宦官充任，故后世亦称宦官为黄门。黄门中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响应招募来的商民驾船出海，到海外各地购求大珠、琉璃、奇石等异物。这就是《汉书·地理志》在描述徐闻等港口时所说由属于少府机构的黄门派使者出海的由来。

《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日南障塞”，其实就是汉代在边疆地带设立的边防设施据点，据宋代王应麟撰写的《玉海》卷一百七十三引述唐代颜师古的话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可见，障塞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建有城，且有人镇守。对于这一问题，

万岁瓦当



《后汉书·百官志》的说法也许更为明确，“边县有障塞尉”，也就是说，位于边疆的政区不仅设有障塞，而且设有“尉”官。另据宋代郑樵的《通志·职官略》记载，障塞尉的俸禄为二百石，目的是防止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犯塞”。这一功能在日南地区而言，当然也不例外，但除此之外，还应有管理海洋船只出入的责任。但由于皇帝身边的黄门直接插手海外贸易事宜，因而从徐闻、合浦出发的官方船队应该不会受到障塞尉的严格检查，反而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优待。

徐闻处于合浦郡和南海郡的中间地带，更适合作为海外贸易的最佳始发港。也因为如此，徐闻港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史记·货殖列传》在描述各地经济繁盛之地时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里的番禺就是指今广州，尽管这里没有说番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但这些商品基本上都是海货，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番禺即广州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观点在史料的支持上没有《汉书·地理志》描述徐闻那么清晰和肯定，而且也没有明确说这些货物是官方还是民间贸易的结果。尽管番禺是海货云集的中心地，但这一现象并不代表番禺就是海外贸易的始发港，我们不能排除汇集到番禺市场上的海外商品是从徐闻经陆路或海路再运到广州的。当然，广州在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不容否认的。汉代番禺作为岭南地区一大贸易都会，此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均有明确记载，其作为海内外商品的辐辏中心，正好为徐闻港提供了向海外输送物资的强大保证。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徐闻才是官府确认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徐闻作为西汉合浦郡的辖县，经过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多方考证，汉代徐闻县大致位于今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南湾村一带。这里位于雷州半岛南端，向东北从陆海两路皆可到达番禺即广州，而向北沿着廉江、鉴江、漠阳江可到达交趾刺史部的治所苍梧，向西南通过茫茫大海经合浦郡可到达交趾郡；向南则跨越琼州海峡抵海南，据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三十六记载：“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朱崖、澹耳两郡。由此来看，徐闻作为一个始发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为其

成为岭南地区的贸易良港提供了天然优势。

徐闻港作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具有自然和人文的优良条件。徐闻地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最南端，面向琼州海峡，徐闻南面的海洋中有三个小岛屿（三墩）作天然屏障，宜于往来船舶停靠和避风，港湾附近有淡水那润溪、讨网溪，三墩上则有淡水井，可积存货物，建房舍。西汉时期的航海技术相对低下，航海多靠季风，出航时不太可能在珠江口的番禺等港口等候季风，而船从徐闻出发，只要有西北季风到来，就可以开船，而在等候季风来临前，正好是购置货物，补充淡水食物的时间，然后等西北季风到来，即可乘风出海南下西行。徐闻港靠近东南亚，向西沿着海岸逐渐经过东南亚各国。徐闻在西汉作为合浦郡下的一个县，但其面积十分广大，几乎包括雷州半岛大部分地区。



侯官上马凳

秦汉时期，徐闻是王朝国家南渡海南岛的军事基地，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地位。秦汉王朝对岭南的统治明显在政治和军事上偏向这里，这从政区控制的需要上也能看出，秦代在岭南设立三个郡，有二个郡在这里，汉代岭南设立九个郡则有八个郡也在这里，所以汉代设立了交趾刺史监察岭南九郡，广信或苍梧成为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顺理成章了，王朝重视对北部湾海域海外贸易的开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徐闻靠近大陆的最南端，自然也成为海港始发站的首选。秦汉定都关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向西部内陆地区，王朝与岭南及海外联系则跨洞庭，溯湘江，经灵渠，顺湘桂走廊，到苍梧广信，沿北流江到鬼门关，而后顺南流江经合浦出北部湾到交趾、日南，通往东南亚各国。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日南、徐闻、合浦三个对外通商港口开辟的缘由，而这三个港口均分布在北部湾沿岸。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徐闻，下一站为都元国，关于都元国，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其就是杜佑《通典》所载的“都昆国”。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称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流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唯中节坚固，芬香独存，取以为香。”从《通典》记载看，都元国是一个盛产香料的国家，尤以藿香非常闻名。

邑卢没国，学者谢光认为它可能是《唐会要》卷一百《拘萎蜜国》中记载的“拘萎蜜国”。宋代王溥的《唐会要》记载：“拘萎蜜国，在林邑之西，陆路三月行。山居饶象，并养之，以供用。显庆元年（656）闰正月来朝贡，……海路一月行。南距婆利国十日行，东去不述国五日行，西北去文单国六日行。”王溥的记载告诉我们，邑卢没国盛产大象，它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贡品。

谿离国，学者推断其地理位置应该在缅甸萨尔温江口至伊洛瓦底江口的沿海地区，这个地区正是缅甸历史上先后建立的孟族直通王国、白古王国、宏沙瓦底王国的所在地。

夫甘都卢国，据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记载：“夫甘都卢国，师古曰都卢国人劲捷善缘高。”可见，夫甘都卢国人善于攀爬，但对夫甘都卢国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法国学者认为，夫甘都卢国就是蒲甘国，位于伊洛瓦底江流

域，蒲甘国最早见于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二《蒲甘国》记载：“蒲甘国王官员皆戴金冠，状如犀角，有马不鞍而骑，王居以锡为瓦，以金银裹饰屋壁，有寺数十所，僧皆黄衣，国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献王，僧作梵语祝寿，以花戴王首，余花归寺供佛。”可见，夫甘都卢国可能盛产黄金，并且是佛教信仰普及的国家。

黄支国，据唐代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记载：黄支国在“合浦、日南之南三万里”，该国自西汉武帝时就到中国“献见”，其进贡的物品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异物。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而至圆者，置之平地，终日不停。”这些奇珍异宝主要是供朝廷使用的奢侈品。已故的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认为：“多数学者都认为黄支国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达罗毗荼的都城建志补罗”。而达罗毗荼的位置在今印度的南部，其都城建志补罗则位于海边。著名的文史专家向达先生也持此说。

汉武帝时远航海外的路线，其途经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众说纷纭，久无定论。现唯有已程不国，被共同认为是今天的斯里兰卡，黄支国是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汉代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经过徐闻港出发可以到达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可以想象当时北部湾海域上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从《汉书·地理志》关于徐闻等港口的记载来看，汉代南中国海的海洋贸易网路四通八达，这些商船从北部湾启航，驶向南洋和印度洋诸国。

汉代徐闻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那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是怎么样的呢？暨南大学著名的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朱杰勤先生认为，西汉时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海，进北部湾，沿越南、柬埔寨、泰国近海处而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后，陆行至孟加拉湾，再航行到印度科罗曼德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那里回航。东汉时，经由雷州半岛或北部湾的南海航路进一步拓展，有更多的国家经由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汉顺帝永建六年（131）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遣使从日南进入中国进贡，汉朝廷赐其王金印紫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日南来中国献象牙、犀角、玳瑁等。这个安敦王通常被认定为是罗马帝国的使者。所谓遣使，大约是在印度的罗马商人冒称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因所献之物均非

罗马所有而产自印度、东非。然而这表明罗马人在掌握印度洋航路以后继续东进，也通过南海海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从罗马到中国的海上航道的开辟显示，中西海上交通具有广阔之前景，而这一切仍是在对西汉武帝时开辟航线的基础上继续拓展。



汉堤

关于徐闻、合浦为海上丝绸贸易始发港的记载不仅见于《汉书》等史籍，近年来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徐闻、合浦地区出土了大量汉代考古文物，这些考古文物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徐闻、合浦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事实。



二桥映月遗址

汉代徐闻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已经毋庸置疑，那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是怎么样子的呢？笔者通过翻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现今关于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最为详细的记载还是班固所载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根据陈佳荣在《中外交通史》考证，这条航行应该是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下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大约五个月，到达湄公河三角洲，泊于都元国即今越南南部的迪石一带，再沿着中南半岛西岸航行北行，经过四个月抵达泰国的湄南河河口，停靠在邑卢没国即今佛统一带。再由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日到达谿离国即今泰国沿海一带。在此弃船登岸，步行十余日达到夫甘都卢国即今缅甸之丹那沙林。从夫甘都卢再度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过两个多月终于抵达黄支国即今印度东南岸之坎奇普拉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于己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然后再向东航行八个月抵达马六甲海峡，停泊在皮宗即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然后再航行两个来月，由皮宗返回日南郡的象林县。

综合来看，这条丝绸之路，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海岸线南下向西航行，到达东南亚、西亚及印度半岛等地，该航线来回历时22个月，沟通了中国、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通过这条航线，中国的丝绸及其他商品辗转流

传到西方，而海外各国的商品也由这条航线源源不断的运送到中国内地。这条航线是我国官方文字记载最早、最重要的航线，其中部分已经延展到地中海东岸，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玻璃）等也从海路运抵中国。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记载：“罗马人远赴中国，以红海生产的珍珠与中国交换丝绸，计每年由罗马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货币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古罗马货币）。”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之盛。

三、考古发掘印证徐闻、合浦为始发港

汉代合浦郡是一个港口城市，合浦港的影响可以远及东南亚等地区，汉代合浦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良好，这从合浦地区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出。考古工作者在合浦县发现了超过一千多座的汉代墓群，成为目前所见的全国最大的汉墓群，至今已经出土文物逾万件。这些文物是汉代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和合浦经济繁荣昌盛的实物证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从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来看，从西汉后期起，随葬品已经相当丰富，如风门岭三座汉墓出土的器物各在100多

徐闻讨网港遗址



件（组）以上，其中的琉璃、水晶、玛瑙、琥珀、黄金串饰等文物，恰好印证了上述《汉书·地理志》所描述的景象。琉璃是合浦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之一，反映了在西汉武帝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外海洋贸易交流的繁盛状况。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广西开凿了著名的人工河——灵渠，成为沟通中原和岭南较为快捷的交通路线，也为中原通过粤西地区的海洋迈向海外世界奠定了基础。西汉武帝时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得益于秦朝对岭南地区开发的基础，据研究，当时从中原长安出发，进入沔水，然后跨过洞庭湖，溯湘江继续南下进入灵渠，再转入桂江、浔江，进入北流江过桂（鬼）门关分水坳，再由南流江南下，直抵位于北部湾的合浦港出海。船只进入茫茫的大海后，限于当时的船只和航线，一般多沿着北部湾向西的海岸线继续前进抵达东南亚和南亚，再往西和往南就可以通往西亚、非洲和欧洲了。此条从海上出发的交通线路，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成为我国汉代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南北两大动脉。

人口数量的多寡无疑是判断传统社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历史文献中描述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多会用“摩肩接踵”、“联袂成云”等来形容。那么汉代岭南地区各郡的人口多少，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关于汉时岭南各郡人口的统计为：交趾郡92440户、746237口，九真郡35743户、166031口，苍梧郡24379户、146160口，分别位居岭南诸郡第一二三名。这一现象意味着汉代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粤西的广大沿海地区，而非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之故，我们也许会明白西汉武帝为何将雷州半岛以及北部湾地区开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不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广州港。因为汉代广州所在的南海郡仅有19613户、94253口，位居岭南各地的第四位。合浦郡尽管只有15389户、78985口，位居第五位，但其毕竟与交趾、苍梧等郡毗邻，且均位于北部湾地区，因而开辟以徐闻和合浦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既有地缘的优势，又有经济的基础，毕竟仅从人口数来看，交趾郡大约为南海郡的8倍，九真郡的户数和口数也比南海郡多近1倍，而二者的土地面积均远不及南海郡之广大。这显然是由于两郡位于当时汉王朝海外贸易的枢纽北部湾和由徐闻、合浦通往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之故。而且汉代王朝派驻岭

南的监察机构交州刺史就驻扎在苍梧郡的首府广信县，于此也可见，今广东西部地区在汉代王朝心目中地位之重要。

秦汉时中央政府开发岭南的两条主要路线分别是灵渠——桂江、潇水——贺江，分别经梧州和封开由西向东进入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苍梧郡所在的西江地区是其必经的腹地和枢纽，又是海上丝绸之路北上长江流域和中原的纽带，故秦汉时期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西江流域为中心，西江流域也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而学术界有人主张封开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徐闻所在的合浦郡人口虽是岭南各郡的第五位，但因其处于汉代开拓海外贸易枢纽——北部湾的北部大陆沿海中心地带，因而自然会成为王朝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的首选港口，进而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徐闻、合浦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海洋贸易的始发港，这也是今天考古工作者在两地汉墓发掘出众多金饼、玻璃、玛瑙、琥珀等的缘故所在，印证了汉代两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

据韩湖初在《关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讨论会研究综述》中的描述可知，合浦望牛岭1号西汉墓出土的两枚金饼，其规格大小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金饼相近，《汉书·食货志》记载说：“黄金一斤，值万钱。”黄金既象征地位和财富，也是国际大宗贸易的货币。合浦汉墓出土大量金饰：串珠50粒、花球29粒、戒指12枚、环形手镯、耳珥（用金箔制成）各2件、龙首金带钩1件。金串珠以橄榄形居多，也有算珠形、吊钟形、扁圆形，外缘有粘珠，可谓种类多样，形状各异。有的金串珠镶嵌珠宝，耳珥则用金银箔制成。与此相比，银配饰、铜配饰反而不多，银戒指、银手镯各3枚，铜配饰仅有带钩2件、带扣4件和发笄1件。这些配饰，既有原来准备输出、后来转为“内销”，反而成为当地官僚贵族的随葬品。也有由海外输入的金银首饰，如金花球就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种金花球泡饰相似，呈半球形，泡壁极薄，泡在底口稍下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球面形的泡体上有9组图纹，均用金丝和小珠焊接而成。这与西方的多面金珠的焊接方法相同，而非我国传统工艺，应是随着海洋贸易而从海外输入的舶来品。



大汉雄风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由官府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船队，带着大量的黄金、杂缯从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与沿途各国的“海市”交易明珠、琉璃、奇石等国内少见的异物，换句话说，即西汉的船队带去的是黄金、丝织品，带回的是明珠、琉璃等物件。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玻璃器（古称壁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各种珠饰，应属于《汉书》所说西汉船队带回的“明珠、琉璃、奇石异物”。广东著名考古学家杨式挺先生指出：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玛瑙、水晶、奇石等大多数应是从海外输入的，而且数量巨大，种类形式繁多，如玻璃珠饰总数超过1万枚。这在江南地区的汉墓中是十分罕见或未见的。这些玻璃器，有珠、管、璧、环等配饰和杯、盘、碗等饮食器皿。珠饰颜色多种，形状各异，有算珠形、球形、圆柱形、橄榄形、鱼形、瓜形和花篮形等。经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手段的测试，这些汉墓出土的玻璃珠均属钾硅玻璃系统，不同于我国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系统。由此也证实这些货

物是由海外输入的。而徐闻、合浦汉墓出土的各类玛瑙配饰，主要有琥珀、玛瑙珠、戒指、耳塞和圆雕小动物等。琥珀原产欧洲，我国云南虽有出产，但汉晋时期多以为出自西域，或谓大秦多玛瑙。也就是说，这些琥珀物件应该可以肯定是海外输入的货物。另外，徐闻、合浦汉墓出土的以玛瑙雕刻的狮子，也属于从海外传入的动物。由此推断，这些玛瑙雕刻的动物和琥珀等配饰应由海外输入，或输入原料在徐闻等地进行加工。



二桥汉代县治遗址板瓦、瓦筒

此外，在徐闻、合浦的汉墓中还出土了不少罕见的马面形托灯陶俑和宽袖大袍的胡人陶俑。据《三国志·士燮传》记载，三国时合浦太守士壹为了讨好吴主孙权，向东吴政权“贡马凡百数匹”，可见马面形有其背景。又记载说，当时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兄弟（分别任合浦、九真和南海三地太守）“威尊无上”，出入“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这里的胡人大约是指来自于印度、阿拉伯的商人或佛教僧侣。因而出现的胡人陶俑，应该是当地人模仿胡人烧制的陶器摆设品。有学者指出：北部湾沿海各地汉墓出土的陶人俑，

从其发短、深目、高鼻和厚唇来看，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者非洲东岸。不仅如此，徐闻、合浦从海外输入的大量象牙、犀角、玳瑁、珠玕等，还沿着西江水道流入到长沙地区，这一点在近年出土的长沙汉墓中也得到证实。

可见，金饼、金佩饰、玻璃器、玛瑙配饰、琥珀印章和陶俑等，一方面见证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徐闻和合浦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徐闻等地是汉代中外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汇聚地。



汉代徐闻县治遗址砖、瓦等

徐闻、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汉代玻璃文物，对于这些文物的来源，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即“外来”与“自创”两种说法。所谓外来就是上述的通过以徐闻、合浦为海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由西方输入。但由于出土的玻璃文物数量较多，有学者就认为是当地铸造而成，而非“外来”传入。我国自春秋开始已能自制玻璃，各地普遍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有盘、杯、璧、耳杯、衣片、带钩、印章，都是在西方古玻璃中看不到的，而且秦汉时期，我国与日本就可能进行了玻璃贸易。其实，岭南地区的交趾郡和南海郡在古代已经能自产玻璃，但是即便如此，这种自产的玻璃也带有明显的海外文化交流的痕迹，晋代

生活在岭南的葛洪曾在《抱朴子·论仙》中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水晶碗即玻璃，交、广即汉代和三国时期的交州、广州一带。葛洪所说的“多得其法”中的“其”，应是“外国”的代称，这说明晋代以前岭南地区已经掌握烧制玻璃的新技术，是与海外技术的传入有极大关联。也就是说，即使这些琉璃一类的器物不是完全从海外输入，也有部分是从海外输入，然后由岭南地区的人模仿烧制，或者是因为海外商人暂时在岭南寄居而向当地人传授烧制技术，所以我们认为，徐闻和合浦出土的大量琉璃等器物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之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日南郡尽管也是《汉书》中所描写的出海港口，但由于其远离岭南腹地和经济发达的黄河及江淮流域，故其地理区位不如合浦，更比不上徐闻，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更多是“障塞”作用。

四、徐闻港海洋贸易的货物

古代雷州半岛物产较为丰富。据宣统《徐闻县志》卷一《土产》记载，徐闻县境内生产的水稻就有十七种之多，分别为山早稻、界稻、光芒稻、早稻、虎头秫、长芒稻、早粘、黄粳稻、红芒稻、香粒、古粒稻、长须糯、芮稻、百际稻、荔枝糯、乌芒、珍珠稻等。此外，还有黍四种、稷三种、麦二种、菽八种等粮食类作物，蔬菜类产品有二十八种；其他经济类作物也相当丰富，如竹十一种、木十七种、花三十二种、果树类三十二种等。与海外贸易出口相关的丝织品有四种，分别是丝、丝绸、水绸、丝经。与水相关的产品，如鱼、介等六十一一种。这些农作物和水产品尽管是清代所记载的产品，不一定全部自汉代以来就有，但通过此也可以推测在汉代徐闻所辖的整个雷州半岛的自然环境是可以适应多种物产生长的，这就为海洋贸易提供了某些产品，至少可以为海洋贸易发展提供充足的粮食资源。

从《汉书·地理志》记载看，秦汉时，海南岛已是“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徐闻和海南在地理环境上相近，因而有学者推测，汉代徐闻也可能出现桑蚕养殖业。总体来看，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是以海洋性农业为主导，《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说：岭南等郡“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犀牛、象牙等今天看来比较珍稀的物种，在秦汉时期的雷州半岛上却较为丰富，唐代段公路（成式）撰《北户录》卷二《象鼻炙》记载说：“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堪为笏，裁亦不下舶上来者，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于此可见雷州半岛产象。据研究，北部湾一带在唐以前已有海洋捕捞，隋唐时已有专业渔民，主要从事浅海捕捞。这些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渔民，历来被称为疍民或水上人家，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疍能没水采取”。范成大所描述的疍民就是遍布于北部湾海洋上以海为生的族群，也显示这一区域的海洋经济起源十分悠久。

徐闻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由于其处于交趾和番禺之间的中间地带，汉代从交趾经过徐闻抵达番禺之间的水陆交通十分频繁，在古代社会，水路无疑是最为便捷的交通线，因而在交趾至徐闻再至番禺这条繁忙的水上交通线，因徐闻处于中间位置，也就成为最繁忙的港口，据唐代徐坚撰《初学记》卷六《地部中》记载，汉唐时期“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即南海）出入。”其中的徐闻港是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四郡进贡必须要经过的港口。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郡贡献的物品主要有广幅布、珍禽异兽、明珠、翡翠、犀角、象牙等珍宝以及水果等岭南特产。

汉代海外贸易主要贸易什么呢？从《史记》、《汉书》等文献来看，尤其是《汉书·地理志》在论述徐闻、合浦的海洋贸易状况说：“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据此，汉代南海丝绸贸易派遣属于黄门的译长，带上应募者一同入海，其带去的物品主要是黄金和杂繒，黄金和杂繒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黄金是汉代货币，但我国并非盛产黄金的国家，历史上我国出口黄金的记载也不多，因此《汉



八卦航标灯座

书·地理志》提到的出口黄金，可能是因为其稀少珍贵才出口的。在黄金与杂缯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杂缯，即丝织品，人们将我国古代的对外商路，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均称为“丝绸之路”，显然也是由于早期对外贸易中输出物品主要是丝绸的原因。

那么，自徐闻、合浦港出口的丝绸究竟来自哪里呢？雷州半岛的桑蚕、麻布，可上溯到新石器晚期。在今遂溪县东边角村附近的鲤鱼墩贝丘遗址出土的陶纺轮，证明五千年前雷州半岛先民已有了纺织技术。秦汉时期，王朝一方面派遣50万大军分驻岭南各地，另一方面又征调数万名中原女性南下岭南，与这些士兵婚配，繁衍后代。这些来自于中原的女子在岭南各地安家落户，也会将家乡的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人。1983年徐闻县华丰岭发掘的7座汉墓中有陶纺轮13个，这些纺轮是否专门用于丝绸制品，尚难完全断定，但其中包含有丝绸纺织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汉书·地理志》中已记载当时海南岛就有“女子桑蚕织绩”的现象，也就是说，西汉时期海南已经有女性养蚕纺丝的事实。徐闻于海南隔海相望，且当时有大量丝绸经徐闻港外运，当地百姓出于利益考量，也会仿造这一能赚钱的时尚商品。

秦汉时期，合浦郡、日南均有蚕桑生产的记载，据宣统《东莞县志》卷

十五在记载“蚕”时就引述东晋时人俞益期的话说，“日南蚕八熟，茧软而薄”。另据乾隆《梧州府志》卷十五记载，俞益期为晋朝豫章人即今江西南昌市人，他“性气刚直”，长期在交州寓居，著有《交州笺》。应该说他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而徐闻和日南在汉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带上两个重要的节点，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因而西汉徐闻县所管辖的雷州半岛应该掌握了桑蚕制丝的技术。否则，唐代朝廷不会要求海康进贡丝绸，明万历二十四年《雷州府志》卷九记载唐代雷州半岛的海康县就向朝廷进贡丝绢四匹，说明雷州半岛的丝绢技术在唐代已受到中原和朝廷人士的认可。一个地方的丝绢能作为贡品，应该说明当地的蚕丝业已达到较高水平。当时雷州半岛临近海南岛，也因为早就有了桑蚕技术，到了唐代时，所织的丝绢才能成为贡品。万历二十四年《雷州府志》卷四记载雷州半岛丝的品种有丝绸、水绸、丝经、丝等四种。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汉代自徐闻、合浦出口的丝绸可能有一部分是本地所产的，另一部分则来自全国各地。

汉代以徐闻港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黄金和丝织品，输入的货物又有哪些呢？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记载为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这是《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的西汉从海外输入琉璃的史料证据。此外，《汉书·西域传》也有“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的记载。所以琉璃是海外贸易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之一。果布也是重要输入商品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是“珠玑、犀、瑁、果布之凑”。有学者考证，果布并非一般水果和葛布，而是东南亚地区一种名叫“婆律香”的香料，这种香料盛产于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汉代从海外输入大量的果布，显然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权贵们的奢侈生活之需要。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2）春，黄支国献犀牛。”又《后汉书·王莽传》记载：“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有学者认为，汉代进口犀牛，一方面是以犀牛角制作盛酒的器具——觥，或以犀牛角做药材；另一方面是把犀牛放在林苑放养以供权贵观赏，如班固在《西都赋》中即云：“西郊则有上林禁苑，其中有黄支之犀。”琥珀是一种宝石，其产地主要在波罗的海沿岸、西西里岛和罗马尼亚等地区，也是汉代从海外引进的商品之

一。玛瑙在世界各地均有出产，我国各地汉墓中均有出土，以岭南地区的汉墓出土最为丰富，于此也可以证明，玛瑙是汉代从海外进口的主要物品之一。其他如象牙、翡翠、玳瑁、水晶、珊瑚、绿松石等贵重的药材、装饰品，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东南亚海道输入。

雷州半岛还是秦汉时期重要的陶器生产基地，这些陶器产品除了当地自用外，估计有部分进入到海外贸易之中。考古工作者在徐闻县汉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陶器随葬品，不仅有陶器还有陶珠。这一技术到了宋元时期仍在雷州半岛延续，据1986年编辑发行的《遂溪县文物志》记载，遂溪县杨柑镇的新埠窑群，东起坎头村，西至永安村，在面向北部湾长约1000米的海岸线上，仍能辨识出宋元窑口45处，连绵不断，遗存丰富，当地称之为“十里窑场”。这些窑口生产的陶器除了满足本地人的生活需求外，可能还通过本地港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销往海外各地。这些陶器产品以青釉瓷为主，器物以罐、枕、棺等为多，因为汉代以来，印度佛教中的小乘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最先进入交趾、合浦等地，该教派提倡火葬埋骨灰，因而绘有宗教神灵信仰纹饰的小瓷棺就是为了适应本土崇佛民众的葬俗之需。

五、汉末以后徐闻港逐渐让位于广州

徐闻港作为西汉时期最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到了汉末以后，其地位慢慢下降。汉末以后，航海者对大海认识的不断加深，尤其是洋流运行规律被运用到航海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船只无需像西汉那样沿着海岸线前行。时广州逐渐崛起，东吴时，从原交州分出广州，又将广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海上对外贸易港口也就从北部湾东移至番禺，外国使节和商人多以番禺为登陆地口岸，番禺已经确立了中国南方对外贸易中心城市地位，唐代姚思廉纂《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列传》记载王僧孺出任南海太守时，广州“常有高凉生

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所谓高凉正是汉代设置合浦郡下辖的县，到东汉时高凉县又升为高凉郡，与雷州半岛毗邻，位于雷州半岛的东部，也是一个面向大海的郡。这似乎说明自雷州半岛通过海洋东行广州的海上往来十分频繁，因而这些“高凉生口”或许正是引导外国海舶进入广州的领海人。也正因如此，广州在岭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也就是说，汉代岭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到汉末已经逐渐东移到了广州，徐闻港独大的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之一。

汉末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主要海上航线由原来的近海航行东移到涨海（即南海）航行，航海技术的变革，使得徐闻、合浦已经没有太大的地理区位优势，正相反，番禺的海陆港口和岭南腹地的地理优势显现出来。据学者考证，汉末出现了“重楼”、“八曹舰”等大型船只，这为深海航行提供了便利。东汉末，徐闻、合浦一带的俚人和乌浒人时叛时附，交趾等地也在三国时一度反叛，攻打合浦等地，这使徐闻、合浦至东南亚各国航线受到严重阻碍。东汉末年，史书上关于徐闻县的记载已越来越少，而吴国统治时期，合浦沿海居民禁止航海采珠，也使得合浦地区失去了其支柱产业。经济的凋敝，大大降低了徐闻、合浦对外贸易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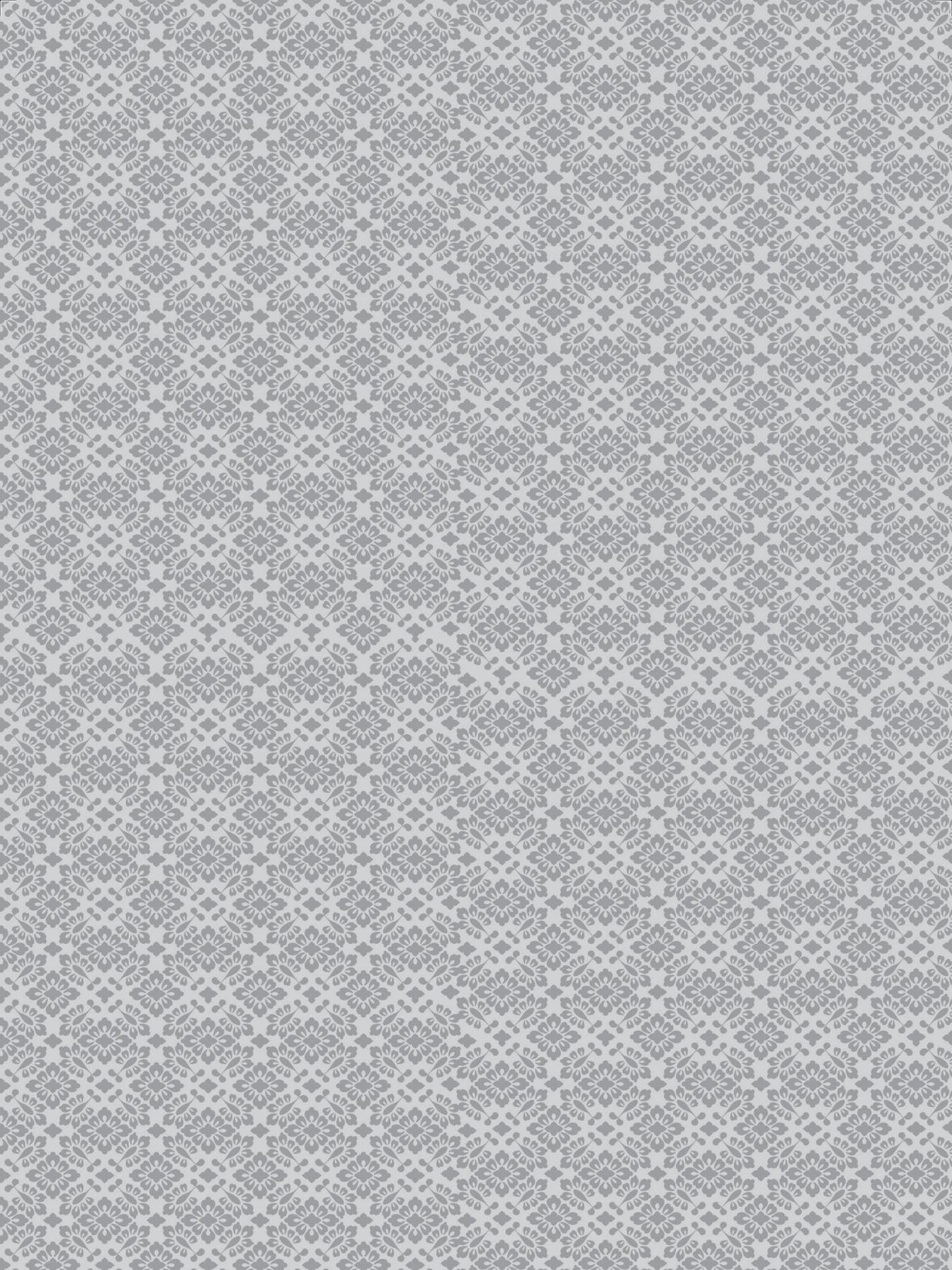
孙吴时，广州初置和交广分治，番禺成为广州的治所，番禺较苍梧或交趾距离六朝的政治中心建康更近，北上大庾岭沿赣江入长江即到达建康，而苍梧、交趾偏安于西南，不如番禺迅捷。番禺的城市建设日渐完善，北魏酈道元



三墩港遗迹

《水经注》卷三十七《沔水》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交趾刺史步骘在广州“建立城郭，绥和百越，随用宁集”。步骘为何要重建番禺呢？据《史记》卷一百十三《南越卫佗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相吕嘉等反叛，朝廷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又任命“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又从他处调集军队汇合于番禺，大败吕嘉，原赵佗所建番禺城也在战火中毁于一炬，步骘将交州治所从广信迁到番禺时，只得加以重新修建，到六朝时番禺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为广州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准备了条件。六朝时番禺作为区域政治中心，也汇聚了不少文化人，诸如虞翻、陆胤等名士长期居于广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而六朝和隋唐的史书一般将番禺城也称作广州城，广州已成为六朝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外贸易日益重要，唐代以广州为港口中心形成了专门的海洋航线，宋代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就列有“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由广州出海所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和航程所需的时间等，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在20世纪初最早注意到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航线的研究，他在《以唐为中心的对外航海交通》一文中认为，当时存在四条经常性的航线，一是广州—南海（东南亚）—锡兰（斯里兰卡）—阿拉伯—波斯；二是广州—南海—锡兰—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三是广州—南海—锡兰—阿拉伯；四是广州—林邑（越南中部）—阇婆（爪哇）—锡兰。这些航线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航行，不再向西汉那样循海岸走弧线，从而缩短了航程，而且海舶出海与季风和洋流方向保持一致，航行速度较快。可见，六朝以后广州的海港地位逐渐取代了徐闻、合浦的地位，成为南方海外贸易最大的海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起点包括徐闻、合浦、广州和泉州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港，从西汉武帝开始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口，直到3世纪30年代起，才被广州取代了主港口的地位，宋元时期，泉州又超越广州而成为主港口。



第一章

徐闻港贸易的社会影响

徐

闻

港

范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雷州半岛设置徐闻县，其县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包括了整个雷州半岛，也就是说汉代的徐闻就是雷州半岛的别称。徐闻县三面临海，这就意味着其社会经济的海洋特征。西汉武帝时，王朝具备了充足的实力，为了宣扬汉王朝的富庶、强盛和威德，也为了满足宫廷和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之需，汉武帝在不断开拓与完善北方以首都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又在南方开辟了以徐闻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朝廷指派官员率领庞大的船队，携带着黄金、丝织品等物产，从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沿着北部湾的近海岸西行，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南部、再转向斯里兰卡，并不断向前方推进，用黄金、丝织品等换取沿途国家和地区的物品载回中国。自此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徐闻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一直是我国海洋贸易的重要口岸，尤其是在联系大陆与海南岛及其东南亚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此对雷州半岛及其内陆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换句话说，汉代徐闻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和中转站。



繁忙的徐闻港

一、雷州半岛的商业活动

《汉书》是我国正史中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其《地理志》中有关徐闻港口的记载应比较属实。在其记载中讲述汉代官方船队所携带的物品除了黄金外,就是丝绸,即史料中所说的“杂缯”。黄金应该属于货币支付类的物品,起货币作用。我们姑且不谈。作为汉代大量出口贸易的商品——杂缯,也就是各色丝绸,在粤西地区的交易情况如何?

秦汉时期,岭南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女子桑蚕织绩”的现象,也就是说已能养蚕织丝,比如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三《舆地略十一》即记载说,汉代海南岛“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而在宣统《徐闻县志》卷一《舆地志》中记载徐闻的丝织品分为四种,即丝、丝绸、水稠、丝经。我们无法肯定徐闻境内的这些丝织品在汉代就已出现,但至少可以肯定徐闻、海南等地是可以有丝绸生产的。但即使徐闻、海南等地生产丝绸,也无法满足当时大量丝织品的出口需要。也就是说,汉代徐闻港的丝绸应该多来自于他处,而这一点在晋朝干宝《搜神记》卷十六讲述的一则汉代故事中得以证实。兹引述如下:

汉九江何敞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安县,暮宿鹄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牛车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肋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

亦死。寿掘楼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

这个故事告知我们，苏娥是苍梧郡广信县人，丈夫死后，她与家中名叫致富的婢女一起，带着“杂缙帛百二十四”前往“傍县卖缙”，行至苍梧郡高安县时，天色已晚，主仆二人就在一个叫做鹤奔亭的地方住宿，最后被亭长调戏而遇害。我们关心的是，两个女人带着大量的丝绸到邻县贸易，说明汉代在雷州半岛的北部地区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丝绸贸易。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苏娥作为一个女性外出贩卖丝绸，估计在其丈夫活着的时候，两人即以此为生，否则，她不可能驾轻就熟地到外地贩丝，还有她从同县一男子处租借牛车，似乎说明当时苍梧郡的贸易是以牛车为交通工具。而从她的穿着“白衣青丝履”来看，她的家境应该还不错，或者说，当时苍梧郡的女性流行穿着丝绸纺织品。

雷州半岛女性从事商业的习俗一直在延续着，即使在宋明强调女性节烈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雷州半岛女性在墟市之中的忙碌身影，如宋人秦观在被贬谪雷州时期，曾作《海康书事》诗，描述他亲眼所见当地女性在墟市中贩卖鱼虾的情形，“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虾鱼，青裙脚不袜，臭味猿与狙，孰云风土恶，白州生绿珠。”所谓的“粤女市无常”是说雷州地区的妇女到墟市贩卖货物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在白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到墟市交易出售鱼虾，这些鱼虾的来源极有可能是家中的男人捕捞所得，也有可能是女性自己捕捞所得，而且这一现象绝对不是一二个女性的个别行为，而是大多数女性的社会行为，否则就不会出现“所至辄成区”的现象。诗中的绿珠是西晋时期大富豪石崇宠爱的一个大美女，其家乡即为今广西博白县，她的名字来源应该和合浦郡出产珍珠有极大的关联。因为今天的博白县地在汉代属于交趾刺史部合浦郡的合浦县。从秦观的记载中还可知，宋代雷州半岛属于典型的海洋经济，市场也随着海洋捕捞的迁移不定而发生变动。

岭南女性在户外墟市从事贸易也不限于海康，估计在雷州半岛及日南郡

等都颇流行，所以秦观在另一首名曰《雷阳书事》中再次描写雷州妇女趁墟的场景说：“旧传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此去尚应远，东门已如云，蚩氓托丝布，相就通殷勤，可怜秋胡子，不遇卓文君。”所谓“东门已如云”出自《诗经·国风》“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可见，这些墟市皆因妇女聚集而成市。雷州一带的妇女不仅在墟市上贩卖鱼虾，而且也买卖日常生活所需的丝绸和布匹。可见雷州半岛妇女的活动范围一直在超越了儒家强调的闺阁界限，“野女出成群”已形成一股社会风气。这部分妇女应该是乡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也与纺织相关联，对社会接触颇多，其目的是从事贸易，而无其他。乡落妇女对雷州半岛的商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雷州半岛妇女的这一行为，大约和在中原地区推行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中原来到岭南的士人对雷州半岛等地的女性趁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甚至要试图解释雷州半岛的女性频繁外出的原因，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十《蛮俗门》中记载说：

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盖阳与阳俱则相害，阳与阴相求而相养也。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墟市负贩逐市以赡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则人不谓之无所归耳。为之夫者，终日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群妇各结茅散处，任夫往来，曾不之较。

所谓“深广”，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指岭南地区最南边的地区，而我们知道岭南最南边的陆地就是徐闻，至少包括徐闻在内的雷州半岛以及合浦郡等广大的区域。周氏把这一区域的男女差异归结为气候所致，他认为在南方盛热的气候中，热属阳，而男也属阳，女则为阴，故因阳阳相害、阴阳相养，所以男性卑小、女性则肥腴“少疾多力”，因而才会出现妇女在城乡墟市之中“负贩逐市”的现象，男子反而退居在社会经济的次要地位，成为岭南社会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雷州半岛女性常年经商的习俗，也影响到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或许他们是相互影响吧，而在海南社会又流行以女性经商的盈亏来判断女性在家中地位的优劣，据明人顾玠在《海槎余录》中记载：

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货，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其地殷实之家，畜妻多至四、五辈，每日与物本，令出门贸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获利多者为好妾，异待之，此黎僚风俗之难变也。

这一记载正是宋代雷州半岛女性趁墟的情形再现。我们从此描述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到了明代女性节烈风气日渐浓厚的时期，海南地区的女性仍保持着频繁的收入市场的行为，以致于出现路途和墟市中都有女性充斥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受到家人及社会的反对，人们反而以妇女趁墟能否赚钱或赚钱多少来评断她们的交易能力。这一现象与中原风俗大相径庭，日本学者佐竹靖彦通过对宋人作品《清明上河图》研究显示，在中原的都市中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踪影。两相对比可见，雷州半岛因为海洋经济的缘故，其妇女形象与内陆的中原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雷州半岛的女性在社会经济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墟市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主力。

汉代徐闻随着港口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王朝组织的官商从徐闻出发到海外贸易，这些官商在徐闻建造房屋居住和储存进出口的货物，其建筑样式对徐闻当地居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发掘的遗址显示，当地土著居民的建筑水平也已接近中原风格，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83年在五里乡二桥村一带发现了汉瓦等建筑材料，在二桥村发现的4处房屋建筑遗迹中，其中2号房遗址略作长方形，长5.48~6.05米，宽2.96~3.30米，房地面用黄色粘土铺垫平整，但不见门道；3号房遗址也是长方形，长6.2米，宽4米，房内情况与2号房相同。这两座房遗址未见房基，柱洞排列规律不明。但废弃堆积中含大量建筑用瓦，说明其房顶是使用瓦建盖的。二桥村其他遗址还有灰坑、水井和墓葬。灰坑有20个，是与人类居住生活密切相关的遗址，其中有的坑壁较直，坑底很平，应属放置物品的窑穴；水井则是当时居民所使用的生活设施，井口直径2.5米，井内的填土发掘出汉代的砖、瓦陶器釜、罐、钵等废弃物。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来看，主要是瓦类，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其特征都属于典型的汉代风格。



二桥·仕尾汉港

雷州半岛港口和墟市的发展，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汉代将徐闻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基因因素，也就是说，正因为徐闻港悠久的商贸历史，刺激了雷州半岛商业贸易的繁荣，据《晋书》卷五十七《列传》记载，晋代交州刺史陶璜向晋武帝汇报说：“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从而导致经济衰败。那么在东吴之前即汉代合浦郡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商业繁荣，正是因为有徐闻港的存在，吸引了各地商人经过雷州半岛汇集到徐闻，进而带动了商业的兴盛。近年来，雷州半岛特别是徐闻汉墓群的发掘，生动地展示了汉代雷州半岛地区商业繁荣的景象。徐闻县汉墓群的发现始于20世纪60年初，截止到80年代初，广东省市县的文物部门在徐闻县境内发现和发掘的汉墓多达近300座，这些汉墓大多距离海滨

不远，或者就在濒海地区。这些汉墓群出土了名目繁多的随葬品，文化内涵丰富、风格多样，既有本地产的珍珠、陶瓷等，又有中原地区特有的文物，同时也不乏“舶来品”，如玛瑙、琥珀、水晶饰品、玻璃饰品以及外国货币等。可见当时商业贸易之繁荣景象。

二、徐闻及雷州半岛的“中枢”联接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后，在岭南的广大区域内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在此后300多年里，整个雷州半岛一直属于汉代的合浦郡徐闻县管辖，时合浦郡下辖徐闻、合浦、高凉、临允（东汉改临元）、朱卢（东汉改朱崖）五县。可见，合浦郡管辖范围之广大，其中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首县，即郡治所在地。东汉合浦郡首县改为合浦县。

自徐闻港口开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以来，也提高了雷州半岛的军事地位。众所周知，雷州半岛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这个大洲应该为海南岛，可见雷州半岛是出入海南岛的门户。每当海南和交趾等地发生社会动荡，汉朝大多以徐闻、合浦作为用兵的大本营和军事基地。《后汉书》卷八十六记载，东汉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义，“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兵万余南下，“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将其兵，遂缘海而进”，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很快镇压了二征起义。雷州城中的伏波祠、马跑泉等古迹，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留下的历史遗迹。汉代合浦郡还包括管辖海南岛的一部分，如朱卢县即位于海南岛北端，与徐闻隔海相望。1983年在海南乐东县出土了一枚西汉银印，印面篆体“朱卢执圭”

四字。汉代在还在朱卢县设立都尉，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海南岛设县归琼州海峡对岸的合浦郡管辖，目的就是要保证琼州海峡的安全和畅通，说明汉朝对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于此也可见徐闻在琼州海峡两岸的重要性。

徐闻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北面“背负雷州半岛”，南临琼州海峡，与海南岛对峙相望，东西两面为茫茫大海，犹如一把利剑插在南海和北部湾之间，将其一分为二，成为南海和北部湾之间往来的枢纽，扼琼州海峡之咽喉，是历代王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也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实施有效管辖并进行商业贸易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先秦时期，当地居民已与其周边的东南亚、南亚地区进行了海上交通贸易。汉朝在徐闻县开辟港口后，与东南亚、南亚诸国通商贸易更为频繁。这一现象在前引《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有详细的表述，兹不赘述。



汉代传入的刺桐树

汉代苍梧郡是当时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南面是贸易港口徐闻县的上级管辖机构——合浦郡，中原的人员和物资要抵达徐闻县，必须经过苍梧郡，最后抵达合浦郡，再经徐闻港口出海。反之，海外物资要运到中原内地，也必须沿此路线往回走。据陈春声的研究，两汉时期，岭南与中原的交流往来之路，是经过湘江和漓江的灵渠，进入今广西桂林，再通过漓江、桂江入西江；或者从湘江支流潇水过萌渚岭，下贺江经今广东封开县入西江，顺西江而进入苍梧郡，再由北流江下南流江，经徐闻港，出北部湾海域远达东南亚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汉代自徐闻、合浦出口的丝绸，主要来自中原地区。自徐闻港口开辟后，通过丝绸贸易，前往雷州半岛的中原商人、官员等逐渐增多，而前述苏娥卖缯行走的路线也说明雷州半岛与内陆腹地乃至中原地区都有着密切的商贸联系。

徐闻所在的合浦郡与北方地区的贸易应该是多元的，大凡有市场或其他需求的物品，都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互通有无，如汉末士壹任合浦太守，为了讨好东吴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这数百匹马的来源，估计是通过贸易获取的，而且极有可能是通过北部湾地区的珍珠贸易交换得来。中山大学秦汉史研究专家张荣芳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合浦郡这些马匹是从西南夷地区获取的。孙权为了加强东吴军队的战斗力，曾“市马辽东”，孙休时期，也曾派人“至蜀求马。”西南夷中的游牧民族，马匹资源丰富，就连以农业为主的“滇人”，也不缺少战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许多镂花铜饰物中就有许多骑士和战马形象。早在西汉初期，“僰僮”和“笮马”就是西南夷地区非常有名的特产和商品，《史记》和《汉书》中曾提到过这两种著名的物品。巴蜀与岭南的交通早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前就已相当频繁，据《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这里的关键点是牂牁江，一般认为，牂牁江属于珠江流域的水系，是联接岭南和巴蜀的重要通道，西汉时期岭南与巴蜀之间以“夜

郎”为贸易中转站展开交流，通过牂牁江上游的夜郎与巴蜀商人交易所需商品。实际上，汉代蜀人“窃出”的不仅仅是枸杞酱，还有其他特色货物，并因此致富，司马迁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僦僮、耗牛，以此巴蜀殷富”。既然如此，则说明这种交易是有规模的，因为量少则难以致富。

因此，合浦郡向东吴政权所贡献的马，可能就是从巴蜀交易来的笮马。据此也可以推测，汉代巴蜀所产的丝绸也有可能通过牂牁江而运到徐闻港被贩运到海外各国。

西汉徐闻港的设置，促进了雷州半岛经济的发展。徐闻成为连接海外与中原的重要枢纽港，官方派出的使者、商人带着黄金和丝绸等由徐闻出发到海外从事贸易，吸引了岭南、西南乃至于中原地区的商贾们把各地商货运到徐闻，从而形成以雷州半岛为中心的商贸圈。与此同时，海外商旅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徐闻，登陆后或继续北上京师长安城，或直接在徐闻港口以琥珀、壁琉璃、玛瑙等奇石异物与中国商人交换丝绸、陶器、珍珠、茶叶等物品。徐闻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辐射和影响雷州半岛经济发展的走向。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区不仅云集了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也吸引了许多胡商。《高僧传》中的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时“因商贾移于交趾”的。当时的岭南由担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统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他两个弟弟分别领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人鸣钟馨，备具威仪，茄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这里的“胡人”许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在士燮家族统治的40多年时间里，岭南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兵荒马乱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士燮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当年南越国的创立者赵佗。当时的雷州半岛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

丝绸之路开辟后，雷州半岛成为中原王朝与外国贸易的冲要之地，吸引了大批中原商人、宦官南下，给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气息。同时，外国商人与使节纷纷来到雷州半岛，使得这里的人们得以接触外国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同时，雷州半岛居民的生活观念开始了改变，并逐步抛

弃了其落后习俗。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雷州半岛地区的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奢靡延伸到死后的世界，出现了厚葬之风气。近年来，从徐闻等地的考古发掘文物中可推测，汉代厚葬之风在雷州半岛地区兴盛。1973年考古发现，位于徐闻县红坎村汉代墓群11座，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室不很大，多窄小，最大的50号墓长2.64米，宽1.36米；最小的42号墓长1.50米，宽0.62米。随葬器物有铜器镞、五铢钱；铁器刀、鱼钩、斧、凿、发钗、指环等，银器手镯、指环；陶器釜、罐、纺轮，还有多种质地的珠饰。另据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志办合编的《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记载，合浦望牛岭1号汉墓墓葬由主墓、通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构成，主室陈放漆棺一具，室内随葬大量铜器、漆木器，北耳室有马车室。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水晶、玛瑙、琉璃、长颈壶、人面纹三足四蒂纹盘、龙首柄魁、铜仓模型器等，造型精美、制作精细、器身多镌刻有纤细均匀精美的各种花纹。又合浦风门岭4号汉墓出土陶、铁、铜器47件，金银器8件，玉石饰品近200件，琉璃串珠530颗，水晶饰品8件，玛瑙串饰3件，琥珀配饰3件。这些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可以说琳琅满目，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厚葬之风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

综上所述，早在两汉时期徐闻港已是商贸繁荣的重要港口。通过港口看出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有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外商贸的繁荣，既加强了雷州半岛与中原、周边地区的连通，促进了当地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又为雷州半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对后来的雷州半岛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港口与墟市的不断增多

自西汉武帝将徐闻开辟为官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后，因贸易之需，人们围绕着徐闻和雷州半岛不断开辟新的港口，以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良性需要。雷州半岛三面临海，因而出海的港口自然也会较多。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当时乘船往海外贸易回程时，因为担心海上受到鲸鱼的侵害，所以许多海商从“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这一记述至少表明雷州半岛在海洋贸易中居于优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一优势在明清时期更加明显，据康熙《徐闻县志》记载，徐闻“地阻海，观涛三墩，前开星镜，前领双髻，后拥翠屏，琼岛外迎，亦壮观也。锦囊、海安天造门户，航海利涉，此其要津矣。”而随着海洋贸易的繁荣，更多的港口在沿海地区得以产生，据宣统《徐闻县志》卷一和卷二统计，徐闻境内的沿海港口有：

黄塘港、流沙港、那黄港、东门港、博赊港、北腊港、奄下港、海安港、白沙港、北门港、三座港、白湾港、那尾港、暗下港、铜军港、南门沟港、鸡网港、临官港、铜锡港、自盘港、东场港、包西港、新地港、讨网港、鲤鱼港、磨练港、踏磊港、落牛港、陈军港、狗吼港、青桐港、乾窰港、博涨港、麻仑港、麻丰港、三墩港、鹅豆港、松树港、水头港、博腊港、大村港、西坡港、南蕉港、盐井港、绿花沟港、北石仔港、关三港、草埠港、新堰港、对楼港、北海港、蓬徐港、港门港、吴家港、乐民所港、调黎港、通明港、海珠港等58个港口。

我们相信，这些被地方志记载的港口，一般而言多具有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徐闻县境内应该还有不少没有被地方志收录的小港，甚至还有民间走私的港口也未收录。这一点恰恰反映出徐闻县强烈的海洋经济发展气息。

在这些港口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讨网港，从20世纪60年代起，徐闻西南沿海

以原大黄乡华丰岭为主的村庄、田野发现大量汉墓群，出土大量陶器、铜铁器和珠饰。1993年1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专家通过大型探方发掘，在徐闻县原五里乡的二桥、仕尾村发现大范围的汉代生活遗址，出土大量有文字的“万岁”瓦当，绳纹、乳钉纹理板瓦，筒瓦和陶器，以及“臣固私印”、“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印纹砖等，证明此处是汉代徐闻县治所在地和徐闻港遗址。据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雷州府志》卷十九《古迹》记载：徐闻县的龙泉淡井在“县西南三十里讨网村，即旧县地。前临海，峙三墩，墩中有淡井号龙泉，天旱祈雨取此勺水，甘雨立至。旧有龙王庙”。这一记载在宣统三年（1911）刻本的《徐闻县志》的“舆地志”中也有记载。而三墩则是位于徐闻县茫茫大海中三座对峙的海岛，每座墩岛上都有天然的泉水，是往来船只取水和抛锚的重要港口，故民间社会又习惯将之称为“小蓬山”，成为汉代讨网港的天然屏障。也因为三座小岛矗立海中，风景如画，古代徐闻人一直把三墩视为该境著名的八大风景点之一，美其名曰“瀛岛联璧”，宣统《徐闻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收录了当地官员和士人为之所赋的诗作：

（一）

南流一望海中清，波起珠联漾几星。
野树翻天资岳润，冽泉出水有龙成。
神藏梵宇千江静，鸥啸芦边两岸声。
舟过看花香满袖，惚恍身已到连城。

（二）

扶舆磅礴起嶙峋，海外高悬削不成。
别有乾坤春不老，独饶风月景常清。
香流玉井泉方涌，翠拥神祠雨午晴。
借问登瀛诸学士，何人到此得长生？

（三）

瀛岛三山玉殿深，珊瑚碧霭郁森森。
珠宫贝阙神仙观，琪草瑶花宝树林。

瑞拥琼楼云散锦，日翻晶彩海浮金。

兜罗锦布珍奇错，抱璞真人独枕琴。

第一首为徐闻县知县孙挹所作，第二、三首分别为徐闻县士人骆克良、吴光森所作，这些诗作属于文人的庙堂雅兴，而作为下里巴人的普通百姓，也从自身的愿望出发，口传着美丽动听的神话故事。传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痴迷于向大海访求神仙，以梦想长生不死。据说，汉武帝时为了寻访海上仙人，曾多次派人向东海探求，最后都是无功而返。但是汉武帝并不死心，他又让朝中派出官员沿着东海一路南下寻觅。终于有一天到达了徐闻县的讨网村（位于今徐闻南山镇二桥村、仕尾村一带）的海面上，船上的求仙官员顿时双目一亮，发现在不远处浩淼的海面上矗立着三处绿色的小岛。时风轻浪细，薄雾缭绕，

三墩汉港



三处小岛似美女遮着纱巾，若隐若现，如幻如真，妙不可言，官员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蓬壶仙境，脱口叫绝。此后，三墩就有了“小蓬莱”的说法。其实，“小蓬山”由俗称的头墩、二墩、三墩，合称三墩的小岛组成。

另据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的《广东通志初稿》卷四记载：徐闻县城“旧在十六都讨网村。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迁于宾朴村。正统间始筑城。天顺间，迁于海安城，弘治辛酉（1501）复迁宾朴，始筑石城。”自此以后，徐闻县城一直就在宾朴。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徐闻从西汉武帝元鼎年间设立县，其县治自此——除了唐代贞观年间短暂设立在蔴鞋村外——至元代都在讨网村。可见，讨网村所在的港口也就自西汉直到元代都是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围绕讨网村建立了一系列的公共设施，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的《雷州府志》卷十记载，“徐闻县儒学，自宋始建，在旧县讨网村。”

而上述的三墩港应该就是由这三个小岛构成，可见，讨网港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都是徐闻县重要的出海港口，其与三墩港等就是名闻遐迩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遗址之一。另据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雷州府志》卷三《山川》记载海康县作为明代雷州府的首县有7个港，分别为调陈港、头港、新庵港、石港、翁家港、离蓬港、洪排港；遂溪县则有9个港，即平乐港、蚕村港、抱泉港、博格港、调神港、麻洋港、通明港、麻澳港、木丹港；徐闻县也是7个港口，分别为青铜港、乾窖港、东场港、那黄港、博涨港、麻仑港、青湾港等。

于此同时，港口的不断扩展，也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埠”是反映地方商业化的指标之一。据宣统《徐闻县志》卷一《舆地志》的“市埠”记载统计：

东关市、博览市、旧廉市、下桥市、龙塘市、迈陈市、戴黄市、福田市、石板市、石桥市、英利市、武安市即曲界市、前山市、麻寮市、锦囊市、下洋市、加墩市、龙兴市、那黄埠、青湾埠、白沙埠、麻丰埠、东场埠、七莲石埠、麻鞋埠、东门下埠、斋仑埠、蔴罗埠、踏磊埠、东松埠、三塘埠、对楼埠、四塘埠、黑树埠、招摇埠即牛寮埠、新地埠、赤坎埠、透海埠、南蕉海埠、博怀埠、聚英埠、博鸡埠、旧县埠、地郎埠、调黎埠等45个。

这些市埠在岭南地区又称为墟市，如曲界市又称曲界墟，英利市也叫英

利墟，福田市即福田墟。这在明代方志中即全称为墟，而且数量有限，如万历四十二年刻本《雷州府志》卷四《墟市》记载，“或兴或废，倏此倏彼”，明代雷州半岛墟市情况为，海康县有26个墟6个市，遂溪县仅有6个墟，而徐闻县9个墟，分别是东关墟、大黄墟、迈稔墟、石桥墟、石牌墟、英利墟、龙墓墟、东莞墟、何家墟。

唐宋以来，随着徐闻以及雷州半岛商业的繁荣，浙江和福建的移民通过海洋来到雷州半岛定居，在这些移民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墟市——阴阳墟。该墟位于今雷州市区的杨家镇南渡河上游的西汀村附近。该圩的圩期与广东其他墟市的最大不同在于，阴阳墟每年仅有一次圩期，时间在农历三月二十二日，这一活动起源于明代，或更早。据村民讲，西汀村过去有下铺河可与南渡河相通，设有港口，水上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物埠繁华。每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雷州市杨家镇西汀村、赤步村、井尾村三村交界的井尾坡（坟地）进行墟市贸易活动，从凌晨四五点开始到下午两三点结束。除邻近村镇人前往趁墟外，还有来自本县以及北海、吴川、遂溪、徐闻等地人，他们用轿抬着妈祖赶集。每年节前（集前），井尾一带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斋戒三天，而各地赶集的商贩也在赶集前将商品运至井尾坡，占据有利位置，架起临时铺亭。墟市当天，还在井尾坡坟场举行祭祀妈祖游神活动，因而可以判断，阴阳墟与福建移民信仰妈祖有关。妈祖信仰随着福建移民的到来而播迁到雷州半岛，每年妈祖诞前日三月二十二，西汀村人都会组织由数百人参加的游神队伍进行盛大的游神祭祀活动，游神活动分两场举行，上午、下午各一场，游神队伍从妈祖庙出发至井尾坡坟场，鼓乐齐鸣，在坟场绕行三圈，三圈毕，返回天后宫，请道士祈福。天后诞日，村里及临近村落的善男信女都会前来祭拜祈福，热闹非凡。阴阳墟流行的习俗是，凡来赶集者至少买一件物品，忌空手而归，以图流年吉利。圩日最为壮观的是正午，其时，摆卖的、趁墟的、游神的都汇聚坡上，人山人海，群声鼎沸，将圩日推向高潮。

据当地百姓传说，井尾坡“阴阳圩”名称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古老故事。话说康熙年间的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凌晨3点，一个来自莆田移民后裔的林姓屠户，挑着猪肉来到井尾坡圩摆卖，他刚放下猪肉担子，点上花生油的灯

火，就有一个人匆匆赶来买肉，而且指明要买7斤7两。林屠户卖肉已有一阵子了，从未见过买肉要求斤两这么精确的事，但客人有要求，而且天尚未明，为图个吉利，他随手割下一大块肉，拿起杆秤一称，奇迹发生了，那块肉不多不少，恰好7斤7两。接着，到林屠户档口买肉的人越来越多，恰好在天大亮时，他的一担猪肉全卖光了。他打烊收市，在清点钱币时，他觉得有枚铜钱非常轻，就将其浸入水中。岂料，铜钱竟浮在水面。屠户突然想起这枚铜钱是第一个客户给的。林屠户思前想后，将这些奇妙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觉得第一个客户是来自阴间的鬼神。这个故事——阴间鬼神也趁井尾圩——随之在墟市上传播开来，“阴阳圩”由此得名。

四、雷州半岛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既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又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清时期，人口频繁的迁移与流动，使得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必然要分享别人的社会资源，从而产生诸多矛盾；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远离故土的情感折磨。正是出于保护自己、协调和解决在新环境中出现矛盾的心理需要，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倡议下，民间往往自发而踊跃地捐资建立乡谊性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在明清时期的会馆中，除了少部分的会馆组织是业缘外，绝大部分都是以乡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地缘会馆。会馆大多制定有规章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聚会、娱乐、演戏等社会活动，所有同籍乡人都可以参加会馆举办的社会活动。会馆各类活动开展的成功与否，是检阅同籍乡人在异地凝聚力强弱的一个重要表现，活动的成功举办，既可以提高同籍乡人在异地的社会地位，也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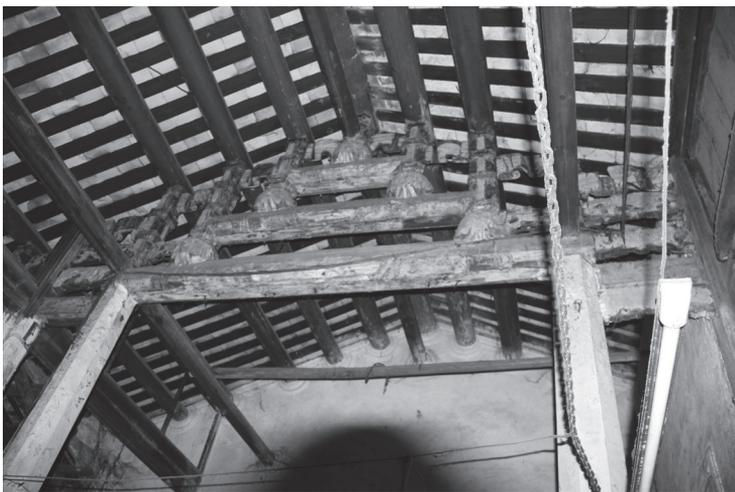
使身处异地的同籍乡人感受到乡情的温暖。依此来看，会馆是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相对集中活动的一个重要联谊据点。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会馆也是检索人口流动异地的索引表。也就是说，只要某地有某某会馆的建立与活动，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该地就有某某地域人口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活动，乃至最后有人定居的事实。

明清以来的会馆都有固定的建筑物，建筑物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无一例外地都会摆放着家乡先贤的神像。会馆建立的经费大多由同籍乡人集体捐助，会馆其实已成为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的一个象征物。会馆建筑物的崇宏壮丽往往成为移民在异地团结力量大小的象征，因会馆多以地缘关系而建立，所以在早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明清时期，我国通过海洋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央政府实现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更为广东商帮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广东得天时、地利之便，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东商帮的足迹踏遍海内外，广东商帮也因此名闻遐迩，具有岭南特色的广货与外国进口的洋货，也一同随着广东商帮而风靡海内外。广东商业会馆也随着粤商的商务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在全国各通都大邑建立起来，成为粤商在异地经营商业活动的重要活动场地。于此同时，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本土，也聚集了省内外大大小小的商人集团，其境内各地的工商业会馆建筑也屡屡可见，这些会馆大多建立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广东本土商人出于商业发展的需要，也在境内各主要市镇建立了众多的商业会馆。除了地缘会馆外，广东本土还出现了众多的行业性会馆。这些会馆的建立与活动，更加凸显了明清时期广东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真实状况。

雷州府也是广东西部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该府的赤坎、海安均是繁华的商业聚集地，商业会馆多分布在这两地。雷州半岛的东部有广州湾，这是我国西南各地出海的捷径。据《湛江文史资料》第15辑记载，赤坎港就位于广州湾北部，该港始建于乾隆年间，当时有福建商人方氏载货物到此贸易，深得当地居民的帮助支持，方氏于是陆续邀请福建同乡来此经商。因福建商人逐渐增多，于是有福建村、福建街和会馆的建立。以后有潮州商人李氏带来家乡商人到此贩卖潮州的菜种、茶叶、陶瓷、草纸等，同时收购高雷地区出产的红塘、

菠萝、黄烟、竹席等土特产到海内外销售。而随着赤坎商业的繁荣，聚集的各地商人也越多。赤坎地区的会馆情况如下：

1. 潮州会馆，为潮商所建。明清潮商到今湛江赤坎经商，为了议事联谊，士绅联合建立该场所。该会馆位于今赤坎福建街30号内，建于乾隆中期，会馆“瓷雕、砖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湾，有的专门从潮州雇请工匠来制作”。该会馆现存文物仅见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五十八年（1793）扩建碑和包鼓石、一百市斤石秤砣等。赤坎潮州会馆在抗战时期是中共南路地方党组织活动地点之一，1939年1月，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在会馆内成立。



潮州会馆内景

2. 高州会馆，系高州六属（化州、茂名、电白、信宜、吴川、石城）士绅商贾行帮性聚处议事场所，建于咸丰三年（1853），位于赤坎高州街25号，1923年重修，馆额“高州会馆”，会馆门联“旅馆盍簪同敬梓，海波澄镜到搏桑”，其撰写者为高州府吴川人林召棠，他是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的状元。楹联反映了高州商人经常出海经商之事实。

3. 闽浙会馆，又称福建会馆，是清代福建、浙江两省到赤坎经商的士绅、商贾、船户们行帮性之聚处议事场所，建于乾嘉年间。据嘉庆二十一年

(1816)《韶安港客商船户出海名次开列碑记》记载了在赤坎经商的闽浙商人45户及船户出海人姓名。韶安港是闽浙商人到赤坎以后用福建地名称呼的一个停船出海小港,码头在闽浙会馆左侧。此外,在赤坎还有福建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购置地皮以福建地名建立的云霄港、漳浦港等,湛江市博物馆从会馆内收集到碑刻四方:嘉庆二十一年(1816)《韶安港客商船户出海名次开列牌记》、嘉庆二十四年(1819)《云霄港碑记》、光绪三年(1877)《漳浦港瓦铺碑》、光绪七年(1881)《云霄港瓦铺碑》,这些碑刻今仍保存完好。据《漳浦港瓦铺碑》记载,同治三年(1864)福建会馆漳浦港买断陈福生祖父瓦铺一间,明确了四至界线,收租以为圣母香灯祀费。

4. 雷阳会馆,此乃清代至民国初年雷州三属(遂溪、海康、徐闻)到赤坎经商者所建,时间在嘉庆年间,位于今赤坎关庙街6号。馆内现存有光绪二年(1876)《会馆田园产业碑》及《迁建武帝庙题捐碑》,1921年会馆被重修,1985年拆除。会馆内原有的文物,包括全部柱础、抱鼓石、石碑、斗拱、雕花垫木及部分梁柱等,都移交湛江市博物馆收藏。

5. 广州会馆:此会馆文献材料不多,但从1986年油印本《湛江市文物志稿》中收录的保存至今的光绪六年(1880)《乐善堂碑记》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乐善堂石碑记》的残缺碑刻中均有“广州会馆”芳名来看,广州会



广州会馆

馆在当地商业活动和公益事业中颇为活跃。从名次排序来看，广州会馆均排在第一，依次为潮州、漳州、高州、雷阳等会馆。另漳州会馆和《漳浦港瓦铺碑》内的福建会馆，相传还有闽浙会馆，三者是否指同一会馆，抑或三者同时并存，待考。

赤坎港的众多会馆表明，这里已经是粤西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基地，这一状况开始于康熙末年，1942年《大广州湾》记载：“赤坎初为一僻静小镇，甚少船只驶至，清康熙末年，有福建商人方某载贷到此贸易，颇与土人相得，寻且陆续招致其同乡到赤坎经营”。据1986年油印本《湛江市文物志稿》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来，赤坎人口逐渐增多。乾隆年间，闽浙商民纷纷到此定居经商，出现福建村、福建街等聚居点名称。接着，潮州、广州及高雷地区商民云集于此，赤坎出现“商船蚁集，懋迁者多”和“商旅攘熙，舟车辐辏”之繁荣，并陆续建立了上述五大会馆。由此可见，赤坎港的兴起与繁荣，正是由包括广东潮州、广州以及闽浙等各地商人聚集的结果。

雷州府属徐闻县的海安港扼琼州海峡之门户，隔海与琼州府的海口港相望，明清时期，海安港是海防重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海禁解除后，广东官府曾在海安港设海关总口，是广东全省海关七大总口之一，成为商贾云集的理想之地。徐闻盛产土糖，海安港是土糖交易的主要场地，设有糖行10多间，每年二三月份，各地糖商聚集海安，进行土糖交易。徐闻县境会馆有：

1. 广府会馆，坐落在清代古城外东关龙尾街（今徐城镇民主路43号），这里是当时山货贸易场地，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广州等地商人在徐经商驻所。据《广州会馆碑记》记载：“徐闻于雷州为属邑，距广州千余里，地分山海之间，田畴膏沃，物产丰美，四方之市麻卉者、荃葛者，卒萃于此土。而吾广人相与谋曰：吾侪贸迁斯地，……无汇集之所……乾隆五十二年（1787）木月落成。”

2. 潮州会馆有三，一在徐城镇民主路120号，建于清代，具体年代不详，新中国成立后，会馆曾经改为县文化馆，后又改设县人民法院，1983年被列为县第一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一在海安港；另一在曲界。

3. 文邑会馆，又称海南会馆，据谭棣华等编纂的《广东碑刻集》记载，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文邑会馆常住铺续捐姓氏碑》记载，道光初年，海南籍客商在徐城东关置有六所常住铺，“时未有会馆也”。咸丰四年（1854）冬，开始募集款项，筹建会馆。因工程浩大，开支不足，咸丰七年（1857）海南客商王载礼等人主持募捐，终于完成了会馆的建设。与此同时，还捐资购置商铺出租，作为会馆的日常开支。

令人关注的是清乾隆末年各地商贾在海安港集资兴建天后庙。据1986年编印的《徐闻县文物志》中收录的《水井天后庙碑》记载，天后庙位于海安镇西南高坡上，乾隆五十一年（1786）修，道光十一年（1831）、光绪二十六年（1900）分别重修，捐款芳名碑载有博涨、海安、顺德、广府、徐闻、田头、顺邑、潮府、口州、蛋家、白沙赤鱼（船）、曲界、海口、纲艇、钦州、澳门（福和庄、隆盛号）、北和、番邑、北海、南关、潮州、水井、公安等23地商贾、渔船捐资情况。妈祖天后是海上商人心目中的保护神，海安众多商贾船户集资兴建天后宫，正反映了清代徐闻海上贸易之兴盛以及海商联合之趋势。



潮州会馆外景

各地商人在赤坎地区的联合，可从乐善堂建设中得到证明，光绪六年（1880）《乐善堂碑记》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乐善堂石碑记》主要是为了地方的慈善事业而设立，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乐善堂首事分别为广州会馆、潮州会馆、漳州会馆、高州会馆、雷阳会馆。

另据彭泽益先生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收录的《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有琼州会馆的建筑。而1985年油印本的《海康县文物志》记载，雷州府属海康县也有广州商人建立的仙城会馆，但资料不详。以仙城会馆命名，本身即具商业之意，如1954年印刊的《北京岭南文物志》即收录有《创建仙城会馆记》称：“称会馆何为也，为里人贸迁有事祭祀燕集之所也。其称仙城何也？昔馆西城士大夫私焉，系之广州也；今馆中城，商旅私焉，不系之广州，所以别也。别而又称仙城，犹广州也”。可见，北京的广州商人正是为了与士大夫所建的试馆有区别，才称自己所建的会馆为仙城会馆。



广府会馆

清代广东境内的工商会馆成员组成情况，从现存的碑刻资料来看，似乎以中小商人为最多，这在建立会馆的捐助名单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嘉庆十年（1805）徐闻《广州会馆碑记》和《徐闻县新建广州会馆题名碑》，详细记载了会馆建造原委和各方捐资实情，涉及296个商号、商行和商店以及370人捐款芳名，款额高达3429两3钱6分白银，其中捐助在10两以上的商号达109家，10两以下达566家之多，占总数的84%左右，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商人会馆。今湛江市赤坎港现存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之潮州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捐题银数，捐助银两在10元以上的53户，10两以下达139家之多，大部分均在10元以下，由此可见潮商人数之众，但大多可能是小商人。建立会馆的经费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这些中小商人的参与捐助，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既反映了会馆对商人具有向心的凝聚力，也反映了商人在异地的精诚团结精神。这应是明清时期各地会馆建立的一个共性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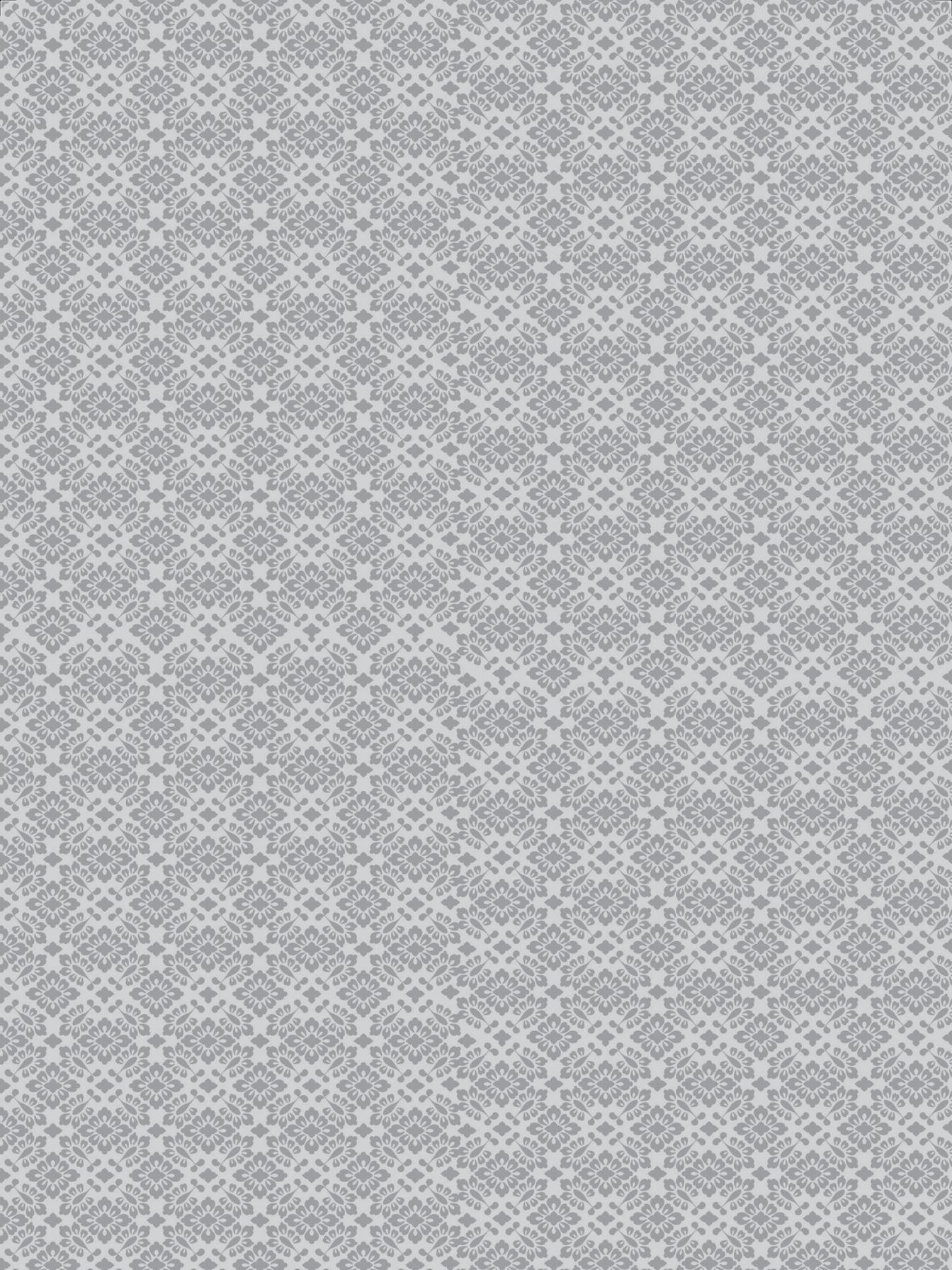
合浦在唐代以后，属廉州管辖。今属广西地区，其濒海地区的商业在明清时也一直保持兴旺势头，在今北海市就有高州会馆和广州会馆的建筑物。但有关这两个会馆的具体情况，笔者无法披阅到史料，在此只能根据中外学者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描述。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第47页列有北海专条：“异乡人仅有高州会馆，土著商人自建敬义堂”。何氏将高州会馆与土著商人相提并论，可见该高州会馆属于商业性质。韩格理在《中国社会与经济》第250页指出，1886年MacGowan蒐集了大量的中国“会馆”规章，从规章中可以看出，商人社团的目的是奠定可信赖的商业基础以稳定市场。这一点在北海的广州会馆规章中说明得更为清楚，韩氏具体引用MacGowan文的内容为：“希望我们所采用的规则能使我们的成员之间行动划一、感受一致，成员们受到同乡人的情谊所约束，经由这些规则的执行，既可使内部成员免于逐渐腐败颓废，同时也可以让行会外的人明白，我们决意反对行为不当的商人，以免使自己困窘。”上述情况说明，北海的商业发展已十分繁荣，商人的活动相当频繁，会馆制定的规章，正是体现了同乡商人团结一致，共同有序地参与市场活动，反对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明清时期，所有的会馆建立几乎都与同乡仕宦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其



徐闻老街道

表现一是仕宦倡议乃至捐助银两建设会馆，二是仕宦为会馆落成撰写碑文，这说明一方面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商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商人的发展需要官方的保护，也许这种需要是互动的。会馆也会受到同籍仕宦的青睐，从而增加会馆的政治资本，如徐闻县嘉庆十年（1805）《广州会馆碑》碑记的撰写人为“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尚书房行走文渊校理国子监祭酒前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教习庶吉士加三级顺德温汝适撰”、“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尚书房行走咸安官总裁翰林院编修前左春坊左口口口御史顺德龙廷槐书。”在今徐闻县境内还有一通《新建广州会馆题名碑》得以保存，其碑刻的开头为：“文林郎知雷州府徐闻县事升钦州知稻村汤元芑、雷州府徐闻营守备加一级右端武尚礼、雷州府徐闻县儒学教谕升廉州府教授加一级鹤山钟仲裕、裁选知县雷州府徐闻县儒学以教授衔训导事加二级顺德罗礼琮”。这一政治资源的融入，为会馆增添了一层政治保护色彩。





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书系

第一篇 星座

徐闻 古港

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编
刘正刚 乔素玲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正刚，安徽人，历史学博士，1993年从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年有余，后一直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工作。

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2004年分别招收首届硕士生、博士生。担任过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现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史学科学术带头人。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出版了《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话说粤商》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等著作。为本科生开设过《海上丝绸之路史》课程。



乔素玲，河南人，历史学博士，曾在河南省濮阳市政府、广州市东山区政府工作；2000年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工作。

2009年晋升教授，现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法律系主任，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合著）、《法制转型的实然图景》、《教育与女性》等著作。

